



抢救文革回忆 积累文革资料 交流相关信息 促进文革研究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20年10月30日第162期

### 本期目录

#### 【萧象专辑】

##### 热点研究

- 萧 象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 萧 象 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 萧 象 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 萧 象 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
- 萧 象 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
- 萧 象 张春桥与安亭事件的再审视

---

#### 【热点研究】

##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

萧 象

作者简介：萧象，1956年生，湖南永州人，先后就读于衡阳师院外语系和湖南师大中文系，获外国文学硕士学位；曾供职于教育机构、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研究兴趣主要在文革人物特别是高层人物的命运及其历史教训方面。（右图为作者近照。）

作为共和国史上最沉重、最不堪回首的一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始至终存在着许多让人感到扑朔迷离的问题，仅以从上海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到北京通过“五一六通知”这一段称为文革发动的时期而言，北京拒登姚文元文章，彭罗陆杨垮台事件，中央一线领导对于毛泽东发起文革的真实态度，一直以来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与久悬不决，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准确把握与深刻认识。因此，在有关文革回忆文章和研究资料不断出现，尤其是步入资讯空前发达的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们重返文革历史现场，再度考察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到“五一六通知”这一文革发动时期既惊心动魄又波澜起伏的历史过程，努力还原文革发动兴起的历史真况，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

## 一

1965年1月，毛泽东在中央四清工作会议上与刘少奇发生的尖锐冲突使其定下决心将刘少奇从政治上搬掉。<sup>1</sup>毛泽东倒刘存心已久，其最初起意可追溯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不久<sup>2</sup>，毛刘有过一次激烈冲突。其后数年，国内外局势不断发展变化，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现实政治的看法愈趋严重和激烈，与刘的分歧加大，对刘愈加不满，心中的想法亦随之酝酿发展成熟，变得坚定而明确。与刘的再起冲突促使毛泽东横下一心将想法付诸行动，而开始着手于倒刘战略的部署安排。

这一年2月毛泽东授意江青前往上海组织写作批判文章<sup>3</sup>，是迈出的实质性的第一步。江青通过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组织《文汇报》年轻编委姚文元担纲撰写。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准备，文章十易其稿，经毛泽东亲笔三次修改，最后上海市委集体讨论通过<sup>4</sup>，1965年11月10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这就是被称为文革导火线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姚文元文章洋洋万言，以学术评论之名行政治批判之实，将剧中反映海瑞当年“退田”、“平冤狱”的情节与1961—1962年出现的包产到户牵强附会，认为剧本借古讽今，鼓吹“单干”，煽动“翻案风”，从而认定历史剧《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矛头直指剧作者——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但批吴仅是巧为名目的表面文章，背后的真实意图乃是以此作为引线，由此及彼，引发一场清算刘少奇及其路线的革命运动。

姚文发表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乘专列离开了北京，一路南巡，最后抵达上海。

---

<sup>1</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6，357页。

<sup>2</sup> 萧象：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ccz/article\\_2011052636214.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ccz/article_2011052636214.html)

<sup>3</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PDF，1233页。

<sup>4</sup> 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1387-2.html>，原载《炎黄春秋》，2011年第6期。

毛泽东此次离京时间长达8个月之久，直到翌年7月中旬方返回北京。在酝酿发起一场政治斗争、准备拿下党内某权要的前夕，预先离开京都这一“是非之地”，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政治习惯，1953年的高岗事件，1971年的林彪事件，都是如此。此次毛泽东有意远离京城，驻于沪杭，遥观北京如何反应与事态发展。

客观而言，如仅以文艺观点、史学影射、话语方式和上纲上线的程度而论，姚文与其时盛行的批判文章几无二致，毋宁说就是1949年之后逐渐形成尤其是1964年以来大张旗鼓的党文化大批判的延续与发展。故此，一般读者由于“对几年来文学艺术领域不断升级的过火批判已经习以为常，对此也未加重视”<sup>1</sup>，正如时为北京市委一般干部（后曾为《求是》杂志副总编）的苏双碧回忆所说：“我看了这篇文章反应并不强烈，只是把它作为姚文元经常打棍子的作风。”<sup>2</sup>

然而，对党内尤其是有政治经验的党内高层，姚文如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中宣部副部长姚溱连夜打电话给跟随邓小平在三线视察的王力说：“有重要文章，要马上看。”王力即叫人送来《文汇报》，读后“觉得很重要”<sup>3</sup>，而正在外地开会的彭真“当即令秘书以最快的速度设法弄到一张11月10日的《文汇报》”<sup>4</sup>。党内之所以如此反应迅速、强烈，不仅是姚文咄咄逼人的批判架势，更因文中所言“单干风”、“翻案风”触及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发生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路线之争这一党内讳莫如深、极为敏感的历史问题。而对一些消息灵通人士，文章的背景更让人感到大有来头。

正是感到了文章的重要，姚文见报当日，《北京日报》总编范瑾即向市委提出转载问题<sup>5</sup>，11月13日北京文教书记邓拓同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和范瑾碰头研究转载问题，出于谨慎，范瑾向上海方面询问落实姚文是否经毛泽东点头以确定转载，因上海守口如瓶，不得而知，邓拓遂电话请示出差外地的彭真。

在姚文见报之前，彭真从邓拓处即已获悉文章消息及其江青背景。这是张春桥顾及文章批评北京副市长，出于邓拓曾为其领导和朋友的关系考量，而透露给邓拓的。<sup>6</sup>此前10月8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谈到阶级斗争时，毛泽东也亲自问过彭真：吴晗是不是可以批评一下？彭真答：可以批评。毛泽东说，让下面批评嘛。<sup>7</sup>在更早的1964年，毛泽东已将《海瑞罢官》列入可供批判的39个《文学艺术资料》，批转至县团级党委<sup>8</sup>，而北京市委闻风而动已组织撰

<sup>1</sup> 郑谦：“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专题史稿》，卷三，5页。

<sup>2</sup> 《我在文化革命初期》，载《领导者》2013年第5期。

<sup>3</sup> 《王力反思录》，374页。

<sup>4</sup> 顾保孜：《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125页。

<sup>5</sup> 《彭真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1188页。

<sup>6</sup> 陈丕显：《文革初期，上海上演的阴谋诡计》，《陈丕显回忆录》连载于共识网。

<sup>7</sup>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ccz/article\\_2011091645442\\_2.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ccz/article_2011091645442_2.html)；朱永嘉：《〈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前后》。

<sup>8</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5，533页。

<sup>9</sup>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6页。

写了批判吴晗的文章，只是中央最高层觉得批判的时机未到而未允发表。<sup>1</sup>因此，对批判吴晗，彭真早已是心中有数，不觉意外。但尽管如此，批吴的姚文所显示出的批判架势，尤其对党内敏感历史问题的触及，为其始料所不及，而这背后又隐约有着毛泽东的身影，经验老道的彭真“感到极不正常”<sup>2</sup>。接到邓拓请示，遂指示暂不予转载。

没有资料显示彭真当时就已察觉到了隐藏在姚文背后的真实图谋。但作为一个正直而有责任感的高级领导，他肯定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属下受到无辜批判，看到上海批判北京的文章刊登在北京的报上，让不良影响在自己的领地广为传播。何况，1965年上半年中央鉴于1964年以来文艺领域的批判过头状况，做出过一项规定：“学术批评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央宣传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上海发表姚文，事先未经请示中央，明显违反规定，也意味着对北京、对彭真权威的侵犯。姚文因此而被彭真做“冷藏”处理。

彭真“冷藏”姚文，诚然是对上海擅自刊文点名公开批评北京副市长这一违反纪律、不无挑衅行为的不满与抗议，也多少含带彭真对江青不满甚至对毛泽东埋怨的情绪贯于其间<sup>3</sup>，同时，还折射了当时中央政治的复杂与微妙。1960年代以来毛刘之间的矛盾分歧，无形中成为执政“路线”之争，让彭真等属僚时常面临着政治行为的两难选择。彭真从延安时期就深得毛的器重，建国后一直被委以重任，对毛从来就怀抱着敬仰之心，但作为一名务实的高级官员，其治政理念更接近于刘。中央一线二线之分，让彭真接触更多的也是刘。因此，敢于置姚文背景于不顾，除了姚文本身违反了中央规定，让彭真可以理直气壮之外，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可为依赖与支持，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中宣部长陆定一明确表示对姚文涉及政治问题不以为然。

由于彭真指示拒载，北京报刊对姚文不见任何反应，仿佛波澜不惊的一泓静水。此与华东诸省市闻风而动，纷纷予以转载，形为鲜明对照，让一直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的毛泽东大为失望，也大为恼火，“指示上海立即印发小册子发行，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sup>4</sup>这就更加激怒了毛泽东，其后指责“北京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滴不进去”<sup>5</sup>。

毛组织发表姚文，目的就是通过批判吴晗激发矛盾，挑起论战，而彭真及北京方面对待姚文的态度，在毛看来就是对待自己的态度。本来，毛泽东一直怀疑自己被人架空，成为一尊表面受人尊敬却实际不起作用的神祇而“大权旁落”，

<sup>1</sup> 李筠：“我所知道的‘三家村’”，载《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济南出版社，2002年，557-558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卷二下册，754页。

<sup>3</sup> 参见萧象：《山雨欲来——彭真冷藏姚文的历史背景》。

<sup>4</sup>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613页注（1）。

<sup>5</sup> 《毛泽东思想万岁》，257页。

北京的冷遇姚文，让毛的怀疑得到进一步证实，更让毛感到发动一场斗争的必要和正确，激发了他要“大闹天宫”的斗志，同时，也为彭真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围绕姚文的转载，北京和上海处在一种对峙的状态，上海希望北京有所反应，而北京偏偏不予理睬，双方相互赌气，暗中较劲，形为僵局。直到11月下旬周恩来和罗瑞卿先后来到上海，明确获悉有关姚文的背景，电话告知彭真转载时，僵局方始打破。

11月29日——12月1日《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先后转载了姚文，并刊发了编者按。《北京日报》按语强调：“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的”，认为“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人民日报》提出“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光明日报》希望通过“百家争鸣”“来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克服错误。”《解放军报》则认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四家按语两种论调，反映了高层两种不同的声音。随着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四家报纸的转载，报上开始掀起批判吴晗及《海瑞罢官》的第一波浪潮。

作为首当其冲的被点名批判者，吴晗在姚文发表后，感受到了巨大压力。“住家里的警卫也换了人，从原来的保卫变成了监视，所有的客人来都要登记。”<sup>1</sup>但他对姚文的批判，并不认服，11月14日他辩驳说道：“姚文元说我的《海瑞罢官》作品产生于1961年‘刮风’的时候，这是错的。我的《论海瑞》发表于1959年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海瑞罢官》是1960年写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领，预见到1961年要‘刮风’”。并说：“姚文元这样批评我，我也不怕。不过我觉得这样牵强附会的批评，乱扣帽子，这种风气很不好，谁还敢写东西，谁还敢写历史？”这段辩语作为情况反映载入内部刊物《光明日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后批道：“我都已看过，一夜无眠。”<sup>2</sup>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田家英谈话，论及当下局势，说：“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愈来愈不行了，”“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翌日，又向专程来杭汇报的彭真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sup>3</sup>

显然，毛泽东这是在为姚文漏洞做补救，以要害是“罢官”来掩饰文章所谓“翻案风”的致命硬伤，同时也藉此将这场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进一步引向政治领域。不过，“要害”之说在逻辑上仍难免让人感到迷糊，因为就算吴晗是为1959

<sup>1</sup> 苏双碧：《我在文化革命初期》，载《领导者》，2013年，第5期。

<sup>2</sup> 逢先知：《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366页。

<sup>3</sup> 《毛泽东年谱》（1949-1976），卷5，548页。

年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与毛所要发动引向刘少奇的斗争也谈不上有何内在的关联，充其量不过是增强吴晗政治问题的严重性。这说明，在文章公开发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毛泽东别无选择，只能勉为其难，以突出政治问题来掩盖学术硬伤，把批判引向斗争更深处。

果然，要害之说一出，吴晗问题陡然升级，“批判文章的调门随之升高，受到点名批评的人和作品不断增多，批判的范围不断扩大。许多学者、作家心情紧张，惶惶不安。”<sup>1</sup>北京市委开始组织对邓拓的批判<sup>2</sup>，学界最高权威郭沫若也感到了危机，以“耳聋，近来视力也很衰退，对于科学院的工作一直没有尽职”为由，向上提出“辞去有关科学院的一切职务，包括院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科技大学校长等等”，以免“在报刊上被公开批判”。<sup>3</sup>

毛泽东利用谈话，批评了两位学界名宿，表扬了两位后起之秀，提出了要害之说，向外界传递出一个强烈信号，他对学术权威的不满，对青年小将的欣赏，对批判《海瑞罢官》的支持。这一批一赞一要害，令学术界人心惶惶，让年轻人欢欣鼓舞，令党内高层喜者更喜，忧者更忧。

## 二

自姚文发表以及毛泽东谈话精神传出，意识形态领域明显发生新的形势变化，也出现新的认识问题。面对新的形势变化和认识问题，中央领导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五人小组”，需要审时度势，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方针政策。所谓“五人小组”，乃是中央鉴于毛泽东极为不满文艺界状况所做出的两个著名批示而专门成立于1965年7月的一个领导机构，由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所组成，彭真为组长，“负责领导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1966年1月周扬患重病住院，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接替主管学术批判工作。

诚然，关于当前发生在学术界的这场批判斗争，来自最高领导毛泽东的态度已是鲜明，“五人小组”贯彻执行即可。但从对待姚文的态度不难看出，“五人小组”尤其是彭、陆，对这场批判显然持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对于毛泽东，又必须紧跟服从。于是，如何紧跟服从，如何具体贯彻执行毛的谈话精神，正确把握“放”的尺度和“批”的广度与深度，成了一道颇费心思的难题。更何况，这是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任何有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从来都是事关重大，且十分敏感，稍有不慎，就出问题。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21页。

<sup>2</sup> 苏双碧：《我在文化革命初期》，载《领导者》2013年第5期。

<sup>3</sup>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1月17日中宣部召集北京六大报刊负责人座谈会，会上所反映的诸多问题，如揭批吴晗政治性错误的尺度，涉及其他点名批判对象的限度，以及批判“要害”问题的文章如何发，发多少，什么时间发，等等，让会议召集人许立群深感棘手，无从回答，亦不敢贸然行事。他将这些问题编为简报，又整理出了与此相关的6个材料，一同报送“五人小组”。

这批材料反映了学术批判面临的许多新问题，其中有反映关锋和邓拓在1962年发表过错误杂文的，有记录许立群与张春桥通话中张反映上海方面有人想批评戚本禹的——因为戚写过一本关于明末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孙承宗的小书，还有关于上海写作、上演《海瑞上疏》情况的。材料旨在说明：当前发表批吴文章的左派并非一贯正确，其自身也存在一定问题，如果批《海瑞罢官》搞影射，上那么高的纲，那么，《海瑞上疏》搞影射不比《海瑞罢官》隐晦，如果对上海《海瑞上疏》的批判可以一笔带过，那么，对北京《海瑞罢官》的批判也该适可而止。<sup>1</sup>

从这批材料，可以看到当时意识形态领域情形的错综复杂。在“五人小组”，至少在材料整理者，邓拓与关锋是同类项，已被列入准备挨批的对象，而代表上海提出要批戚本禹的则是张春桥。这至少说明：（一）当时思想战线的左、右之分不像后来说的那样泾渭分明；（二）京沪政争双方都在抓对方的小辫子。王力关于此事的一个回忆，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历史的复杂及真实。“听说彭真整了邓拓的材料，还有关锋、戚本禹的材料”，王力感觉不妙，马上给彭真打电话，说：“你要慎重考虑，毛主席说关锋、戚本禹是左派，毛主席刚刚骂了杨尚昆，杨尚昆把左派打成右派，其中就有戚本禹。你可不能送关锋、戚本禹的材料。彭真一听也慌了，说我赶紧追回来，可是已来不及了，文件已经送走了。”<sup>2</sup>

文件（材料）是2月1日送出去的。2月3日彭真召集五人小组会议，根据前述材料，对涉及学术批判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会后，由许立群、姚溱起草了一份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纲原本无署名，姚溱临时加上“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字样，从此“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之名逐渐传开。

作为阶级斗争时代的产物，“二月提纲”具有明显的极左思维特征，它将自批《海瑞罢官》以来的大批判首先在政治上做出定性，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场大斗争，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sup>1</sup> 龚育之：《〈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载《百年潮》，1998年第3期。

<sup>2</sup> 《王力反思录》，379页。

但它同时提出，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要提倡‘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要有破有立”，“报刊上的讨论不要局限于政治问题，要把涉及到的各种学术理论问题，充分地展开讨论。”并强调“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机构批准”。

显然，提纲制定者其主旨依然是试图把这一斗争限制在学术范围内，避免把学术界的思想斗争发展为政治运动。这样一份旨在“维稳”的提纲同毛泽东鼓动“鸣放”的意图自是大相径庭。2月8日当彭真率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成员飞抵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情况时，毛泽东知道提纲已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常委讨论通过，就“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连问了两次：‘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回答说：吴晗当然有政治问题，但据查，他和彭德怀是没有牵连的。毛泽东说：吴晗不罢官了，还照当他的市长，这样就不至于形成紧张局势，就可以‘放’了吧。”<sup>1</sup>毛的此番讲话，让彭真以为毛已同意认可，遂将提纲作为中央文件迅即转发全国，要求各级党委“遵照执行”。

殊不知毛泽东心有城府，他只是碍于常委业已通过，不便马上推翻而暂缓行使否决权而已。

就在毛泽东恼怒于“二月提纲”之时，一份题为《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和关注。作为毛泽东夫人，江青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恪守本分，行事低调，深居简出，但进入60年代，随着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和对文艺界现状的极大不满，江青开始抛头露面，变得活跃起来，以文艺领域“流动的哨兵”角色现身于当代中国政治舞台。1965年江青组织撰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多少还带有隐身于幕后的意味，进入1966年则正式走上了前台，其标志便是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

这是江青根据毛泽东指点，意欲“请尊神，请解放军这个尊神支持”，而向林彪提出的在上海搞的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等一行6人受命参与座谈，时间与“二月提纲”几乎并行。所谓座谈不过是江青将大家召集一起听她独自就文艺问题一人谈而已，其他大部分时间不是看电影和演出就是看文件。江青故作神秘，一开始就提出“不准记录，不准张扬，特别不准让北京知道”的规定。尽管如此，刘志坚等为回京向上汇报，还是根据大家事后的追记和回忆，整理了一份3000来字的《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sup>2</sup>，不意招致江青的责怪与不满，认为“歪曲了其本意”，其“打算议一议就算了，没有想到搞个什么文字的东西”。<sup>3</sup>但毛泽东从中看到了价值和作用，

<sup>1</sup> 肖东连等：《求索中国——文革前10年史》（下），1153页。

<sup>2</sup> 刘志坚：《风雨征程》，209-215页。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44页。



指示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与其中，帮助修改，加以提高。

《纪要》几经修改，内容大为扩展，增加了座谈没有的东西，篇幅达到一万字左右，其中毛泽东亲笔加写不少重要段落，并将标题改写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使文章的份量和召集人的身份由此大增。

林彪给予《纪要》高度评价。按照毛泽东旨意，《纪要》以中央军委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并作为中央文件于4月10日批发全党。其后不久，周恩来找到刘志坚等，提出刘等代为中心写的批语对《纪要》的评价不够，需要重写，并亲自口授修改要点，嘱咐改好的批语交江青看后，再交其审定。经周审定的新批语随文件由中央重新下发，同时收回原批语的文件。<sup>1</sup>新批语字数扩大近三倍，对座谈会做了更高的评价，尤其强调提出毛泽东亲笔对《纪要》三次修改，更显出《纪要》的重大政治意义与作用。而在中央正式批发《纪要》之前，林默涵即在全国创作会议上“抢先”宣传介绍了其中部分观点，虽然他自身已是被《纪要》炮制者视为批判的对象。<sup>2</sup>此从一个侧面反映《纪要》在党内高层得到广泛赞同和接受。

《纪要》对建国以来的文艺工作成绩进行全盘否定，断定“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并强调“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正是“文艺黑线专政”这种对文艺领域的极端看法和尖锐认识，使《纪要》在方法论上与“二月提纲”针锋相对，成为用以批判文艺界“黑线人物”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而打倒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的理论锐器，为文革的进一步发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舆论准备。

### 三

毛泽东授意江青组织撰写、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意识形态领域波澜的同时，开始有步骤地调整、清理中央和军队的重要职位和人员，进行新的人事布局，以此来确保属下的忠诚可靠，政令的畅通无碍，和对军权的绝对控制与掌握。

1965年11月10日——《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的同日，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据《杨尚昆日记》，杨是此前十天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48页。

<sup>2</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52页。

得知这一消息的。王力回忆，早在这年夏季的一次高层会议上毛泽东曾提到杨尚昆的问题，责问“杨尚昆为什么还不走？”毛泽东“要杨尚昆离开北京，说杨尚昆搞窃听”。<sup>1</sup>据此，毛泽东应于更早之前就已有此动议。

所谓“搞窃听”，亦称“秘密录音事件”，乃是发生在1961年的一桩陈年旧事。当时毛泽东乘专列南巡，偶然发现车上装有录音设备，其讲话未被告知就被录音，不由大发雷霆。其实，对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的重要讲话录音是中办1950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一项工作制度，得到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的同意批准。但毛泽东很多场合的讲话并不喜欢被记录，更不用说被录音，而中办则认为党的主席的每一次讲话与谈话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指示，都应该也需要记录与保留。“秘密录音事件”盖由是而发生。此事牵涉多个部门，包括中办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在内的众多人员为此获咎，杨尚昆检讨过关，一时表面安然无事，却从此失去毛的信任。毛泽东要发动倒刘斗争，必须清除外围障碍，控制关键岗位，杨尚昆这样的可疑人员自是不能继续留用。于是毛泽东旧事重提，以此为由，把杨调离中南海，贬放广东，由汪东兴取而代之，巧妙地将位处中枢的中办主任职位转移到忠诚可靠的亲信手中。

其后不久，12月8—15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总参谋长罗瑞卿会上突然遭到整肃。罗瑞卿是1959年庐山会议林彪接替下台的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由林提名，毛泽东批准，担任总参谋长的。林与罗从井冈山红军时期起就一直是上下级关系，两人间由此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友谊。然而，自1962年林彪患病、贺龙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罗瑞卿与贺龙以及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触开始趋于近密，有意无意地疏忽了林。罗瑞卿工作能力强悍，深得刘少奇的欣赏，一度视为下届的国防部长人选，但作风独断，擅权自主，得罪了部分老帅。这自然引起林彪及其他老帅的不满，同时更引起久蓄倒刘心计且视军权如命根子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不安，虽然毛并不怀疑罗的忠诚，但罗与刘、贺关系的密切却不是毛泽东所愿意看到的。毛泽东要搬掉刘，首先军权要绝对掌握在自己人手中，林和罗都是毛的亲信部下，毛知道林罗的关系，也清楚近年来两人间的纠结，在二者之间毛要选择的自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据近年出版的有关资料披露，至迟不晚于1965年6月，军中老帅间就已经出现了不利于罗瑞卿的言论。其间毛泽东对叶剑英谈论罗瑞卿问题时说道：“我说罗长子浑身是刺吧，刺到了你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没有？”叶向林传达了毛对罗的这一看法。<sup>2</sup>11月30日，林彪做出回应，写给毛泽东一信，说：“主席：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怕

<sup>1</sup> 《王力反思录》，368页。

<sup>2</sup> 《邱会作回忆录》，378页。

有碍于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在联系才知道的杨尚昆的情况（叶剑英讲的），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在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信中所称“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乃是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人，其于此前已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sup>1</sup>

林的表明态度，让毛感到批罗条件与时间业已成熟。12月2日毛泽东谈话提到：“罗个人独断，罗是野心家。”<sup>2</sup>并在一份军队上报材料上批示说道：“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sup>3</sup>“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的“人们”，指的就是罗。这是毛泽东决定要抛出罗所发出的一个明确信号。

“反对突出政治”是会上对罗瑞卿提出的一项重要指控。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61人参加是次会议。一个本由7人组成的常委会议扩大到几近9倍，目的只为整肃一人，显示了毛泽东为保证会议万无一失而一反常规的政治策略。刘少奇、邓小平等作为常委却事先不知会议内容，则说明会议具有逸出常规的非常性质。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罗瑞卿被解除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两项重要职务，军委秘书长由叶剑英接任，总参谋长职务由杨成武“代”。在1966年3月召开的北京会议上罗瑞卿继续接受批判。北京会议规模更大，人数更多，几近百人。这些原来朝夕相处的亲密同志与战友，一夜之间“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的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而且“都以十分敌视的眼光望着”罗，用极端化与情绪化的语言指控罗，斥其为“野心家”，“阴谋家”，“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代理人”。<sup>4</sup>罗瑞卿不堪其辱，跳楼自杀未遂，引起群情激愤，招致更为严厉的批判，其问题随之升级，被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在《海瑞罢官》大批判中，罗瑞卿是最早表态要求《解放军报》转载姚文元文章，并告诉彭真也应予转载的，但这并没有为他带来转机，挽回被整肃下台的命运。在毛泽东打倒刘少奇这一盘宏大棋局和预谋中，罗瑞卿所处位置和行为注定了他是必须抛弃的一枚棋子，也因此成为遭遇清洗的第一人。

这种对视为党内异己分子的批判和清洗，毛泽东将其形象却又让人颤栗地比

---

<sup>1</sup> 《邱会作回忆录》，393页。

<sup>2</sup>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244页。

<sup>3</sup> 《毛泽东年谱》538页。

<sup>4</sup> 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南出版公司，1999年，212页。

喻为“剥笋”——将那些坏掉了的外皮一层层剥掉。<sup>1</sup>毫无疑问，杨尚昆与罗瑞卿显然属于暴露在外已经看见的必须要剥掉的第一层“外皮”。至于在此之后，还会暴露出谁，还要清除什么人，可以说毛泽东胸无成竹，事先尚无完全把握。只是随着《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展开和发展，毛泽东进一步发现了新的“坏掉了”的必须要去除的“笋皮”，这就是彭真和陆定一。

前述，彭真和陆定一领导的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抵制，客观上让毛泽东发起倒刘斗争的战略意图贯彻伊始就受到阻碍，毛泽东为之大为恼怒，但一时隐忍，没有发作。或许在毛看来，彭、陆一时不能体察领会其深意，且暂以认识问题观察之。但在其明确表态支持姚文，指出要害问题之后，彭真还不识时务地为吴晗辩护，制定出台妨碍斗争发展的“二月提纲”，那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立场态度问题了。毛泽东不能不对彭真、陆定一等产生深刻的怀疑和想法。

而彭真似乎并未觉悟。3月11日，在听取许立群汇报上海宣传部长杨永直请示“学阀”是否有所指时，彭真义正词严，叫许电话回答杨永直：一、学阀没有具体所指，谁头上有疮谁就是阿Q；二、问上海发表姚文为什么不与中宣部打招呼，上海市委的党性哪里去了？明知毛泽东久驻上海，支持姚文，彭真仍意气不平，批评上海，难免授人以柄，“政治不正确”，让“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反对姚文元文章也就是反对毛泽东”的怀疑和指控得以坐实。张春桥在得知彭真的答复后说道：“现在有把握了，这个电话说明中宣部和北京市委是反对姚文元文章的，‘二月提纲’是指向姚文元的，也就是指向毛主席。”<sup>2</sup>彭真的这一言行加速了自己的被打倒下台。

彭真何以会“明知故犯”？这是否真的意味着与毛泽东作对，如张春桥所指？自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张闻天直言犯上被打倒下台之后，毛泽东权威如日中天，党内再也没有出现过公开的批评声音（彭真七千人大会上对毛的批评，有人认为是毛故意让彭说的），更不要说反对，人们从此变得谨小慎微，学会了迎奉自保，即便在七千人大会前后毛泽东因大跃进失败而处于政治的低潮期，其权威仍岿然不动，人们内心或有看法但至少表面上一如既往保持着对毛的尊敬拥戴。彭真所以如此，很难说是有意与毛泽东作对，不然，就无法解释其4月组织的批“三家村”举动（见下），更不能解释其复出后对毛的维护，很可能是他无法原谅上海的冒犯，彭真是常委之后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而上海在柯庆施之后其第一书记不过是一中央委员，在讲究等级森然的官场，彭真需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再就是误判了形势，没有足够意识到事情发展的严重性，低估了毛的强势

<sup>1</sup> 郭德宏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卷三，38页。

<sup>2</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62页。

反弹力。这种误判使彭真付出了惨重的政治代价，用毛泽东的评说，就是使“事物走向反面，他自己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sup>1</sup>

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明显表现出对北京市委和中宣部的不满，会上警告“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紧接其后，通过对康生等人谈话，毛泽东进一步指责“中宣部、北京市委包庇坏人”，提出“中宣部、北京市委再包庇坏人要解散”，“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击修正主义。”“要彭真向上海道歉。”<sup>2</sup>矛头直指彭真和陆定一。

（就笔者阅读所及，这是自发动倒刘斗争以来毛泽东首次使用“文化革命”这一用词，这意味着今日之“文化革命”这一概念至此在毛头脑中方开始正式形成。）

深陷危机的彭真，始觉形势严重，前途不妙，为争取主动，表现积极，于4月上旬抛出邓拓，继而指示《北京日报》于4月16日大幅刊发严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文章材料<sup>3</sup>，作为挽救危局的最后努力。然而，一切为时已晚。

19日毛泽东在杭州再次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彭真自知在劫难逃，一到杭州即请求与毛面谈，提出“只讲二十分钟”，但被拒绝。<sup>4</sup>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彭真被停止工作。

陆定一问题同时被提出。意识形态领域执行了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方针政策，作为总领其事的中宣部长，陆定一难辞其咎。但会上议论更多的是陆妻严慰冰写寄叶群的“匿名信案件”，匿名信涉嫌辱骂和攻击，两年前案发侦破<sup>5</sup>，此前不久始得处理，陆定一牵连其中，成为批判话题，反映出中央高层政治与人事纠结的错综复杂，亦折射了不同政治势力相互较量的此起彼伏。

党内因长期政治斗争的激烈复杂而形成一倾向，将并无关联的打击对象捆绑一起，冠以某某反党集团的名义进行批判，以此夸大反党错误与性质，激发人们的义愤，将对手置于束手待缚无从翻身的地步，从而显示这一斗争的严重性和必须性。彭真和陆定一，加上前已倒台的罗瑞卿和贬放广东的杨尚昆，亦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名义被捆绑一起，作为倒刘运动的第一批被打击者被推上斗争前台，在随后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接受批判。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71页。

<sup>2</sup>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0页；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66—68页。

<sup>3</sup> 李筠：《我所知道的‘三家村’》，载《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济南出版社，2002年，565页。

<sup>4</sup> 李雪峰：“‘文革’的发动”，载《中国共产党历史口述实录》，济南出版社，2002年，571页。

<sup>5</sup> 见刘少奇1966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四

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于5月4日——26日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一切内容程序均按其部署安排进行。

会上对彭真、陆定一进行了激烈批判，甚至“出现了群起而攻之的局面”，康生、陈伯达、贺龙、李先念、陈毅、薄一波等先后发言，众口一词，辞色严厉，指责彭真篡党夺权搞政变。<sup>1</sup>对陆定一，周恩来态度之严厉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向陆定一砸去，杨成武则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其眼鼻底下，威胁说道：“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叶剑英甚至出了会场，“在车里还是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sup>2</sup>惟朱德不同意会议做法，对批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却因此受到批评而被迫检讨，因其曾对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顶峰一说有异议，会上乃被指为怀有野心，“想搞政变”，“要黄袍加身，当皇帝”。<sup>3</sup>

将打击与批评对象耸人听闻地指为“篡党夺权搞政变”，这当然是与会人员毫无根由地无端指责，反映了党内政治斗争非理性情绪化以及整人不惜诬陷的恶劣一面，但另一方面却又是与会人员对毛泽东有关讲话精神心领神会与迎合响应的一种表现与证明。自1964年尤其是1965年以来毛泽东在不同时间和场合多次提出中国可能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问题，上海会议后甚至问到许世友：“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怎么办？”<sup>4</sup>“北京发生政变”，这诚然是毛泽东对现实政治危机的最大忧虑与最严重判断，是由倒刘图谋引发的一种暗室猜测与想象，又未尝不是用以抹黑与指控对手的借口与手段，毛正是以此来刺激、挑动同僚与属下的政治神经，唤起其政治警觉，同时亦用以作为政治忠诚的一种观察与检测。

18日林彪在会上发表著名的“政变经”讲话，对毛泽东这一思想做了精准的解读和诠释。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不惟如此，林彪高度称赞毛泽东，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泽东“北京发生政变，怎么办”的担忧，也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的行动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sup>5</sup>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87页。

<sup>2</sup> 《邱会作回忆录》，439页。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91页。

<sup>4</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83页。

<sup>5</sup> 《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16-23页。

就像七千人大会上在毛泽东感到巨大政治压力时，林彪挺身而出，发表讲话，为毛辩护解围，此次在毛倒刘的重要时刻林彪再次站台挺毛，发表讲话，对毛表示了最高的赞扬和坚定的支持。林彪不只是个人在讲话，他是在代表军队发出声音，表明态度。这就意味着毛倒刘斗争已获得军队的拥护与支持。

除了军队的支持，毛泽东也需要师出有名，需要将个人意志转化为中央委员会的集体决定，以名正言顺的法定名义进行文革。这就是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另一重要议程——讨论通过被称为文革纲领性文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通知是在5月16日通过，也就称为“五一六通知”。

《通知》按照毛泽东4月第二次杭州会议讲话精神由陈伯达领衔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而成。《通知》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认为“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当前学术批判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高潮”，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为此“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是《通知》中最为紧要、也是被视作“画龙点睛”的一段话，为毛泽东亲笔加写。“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毛泽东以此来喻指刘少奇，曲折而又明确地传达出文革发动之倒刘意图。由于用语隐晦，词义含糊，人们或一时未能、未敢联想到刘少奇。

但这并不等于刘少奇本人亦蒙在鼓里，昧于不察。自两人上次发生激烈冲突，毛对刘发出动一个手指就能将其打倒的威胁，<sup>1</sup>刘被迫向毛检讨之后，就有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而变得十分低调。批《海瑞罢官》，刘知道背后有毛的身影，也并不赞同文章观点，当彭真电话请示征求刘意时，王光美代为接听，以刘未及读姚文谈不上看法为由作为答复。<sup>2</sup>打倒罗瑞卿，刘少奇事先并未与闻，事中未置一词。彭真挨批，刘少奇正在出国访问，俟其回国参会，彭真倒台已成事实，刘亦未表示异议。面对来自毛泽东的巨大的压力，刘少奇采取谨言慎行的自保策

<sup>1</sup>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118页。

<sup>2</sup> 叶永烈：《陈伯达其人》。

略，试图缓解与毛的关系，改变毛的看法，以此来化解危机。刘的一厢情愿没有带来任何改变。诸多资料可以支持如下推断：刘少奇从“五一六通知”，从“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影射，感觉到了毛泽东冲己而来的权力图谋。<sup>1</sup>但尽管察觉到了毛的意图，感到自己可能挨整，刘少奇却有苦难言，而别无办法。因为毛泽东“反对修正主义”的文革宏大叙事，首先占据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道德制高点，而“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这是包括刘本人在内的全党的共识，刘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反对的理由，而在毛泽东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之前，刘少奇又岂能自己主动对号入座，惹火烧身！

这样，刘少奇就被置于一种非常尴尬、难堪的境地，明知“五一六通知”是针对自己，却又不能不带领一帮党政大员表决举手予以通过。在这里毛泽东显示了其政治谋略精妙高超的无与伦比，也反映出其治人手段老道阴狠的无以复加。不过，在付诸表决通过时，刘少奇的一番表态讲话让人们感到刘多少还是表达了自己的一种憋屈、不满与愤懑：“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现在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sup>2</sup>

所谓“独断专行”，非毛莫属。而“大家意见”，指的自然是与会多数人的意见。这一情形恰如国外研究者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将经其一手挑选的支持者扩大进会议，“尽管他们不能投票，但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也使得详尽的讨论成为不可能之事。”<sup>3</sup>不独北京会议如此，上海会议和杭州会议亦是如此。这数次决定性的重要会议均以扩大形式举行，这是毛泽东利用会议形式贯彻推行个人意志的实现方式，也是其党内斗争制胜策略的鲜明体现。

近年来有政治学者研究指出，无论怎样的体制，对领导人而言，在由名义支持者、实际支持者和致胜联盟这三种政治构成中，只要控制了被称为核心利益集团的“致胜联盟”，就可以确保胜券在握，而立于不败；所谓民主与非民主，其区别仅在于构成“致胜联盟”人数的多寡而已。<sup>4</sup>据此，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三层政治构成中，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无疑就是毛的“致胜联盟”。在这“致胜联盟”的7位常委中，朱德和陈云文革前实际已退出决策层，这样就只有毛、刘、周、林、邓5人，毛要发动文革打到刘少奇，只要获得周、林、邓的支持即可把握胜券。前述，在这一堪称文革发动的非常时期，林、周均有积极表现，与毛配合默契，是毛的支持与合作者，惟邓态度暧昧。然

<sup>1</sup> 参见萧象：《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共识网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3051483334.html](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j/ljsj/article_2013051483334.html)。

<sup>2</sup> 金冲及：《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010页。

<sup>3</sup> 肖特：《毛泽东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425页。

<sup>4</sup>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独裁者手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30-31页。



而，在“面临扩大了候选人范围，如果不能证明自己足够值得信赖和对国王忠诚，很容易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sup>1</sup>的情形下，最初的“态度暧昧”，很快也就会转成为一种默许。正是通过搞掂并控制了常委会这一致胜联盟，毛泽东得心应手地使其个人意志成为集体决定，让倒刘图谋得以顺利贯彻实施。

就这样，彭罗陆杨毫无阻力地被打倒下台，“五一六通知”一字不易地得以通过。这一结果一方面加强了党内的危机感，使人们产生严重的错觉，认为毛泽东英明正确，判断无误，所言不虚，中央果真出了修正主义，另一反面更坚定了毛泽东克敌制胜的信心和决心，让毛雄心勃发，堂而皇之地可以将发端于密室的文化之火轰轰烈烈地燎原于全党、全国。

## 五

毛泽东要把发生在上层建筑的文化批判和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由上而下，引发为一场“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语）这样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除了舆论宣传造势，还需要支持形成这样群众性运动的客观历史条件、社会制度环境和民众心理基础。1960年代的中国社会恰恰具备并为其提供了这样的条件、环境和心理基础。

1960年代的中国，因与苏联关系的走向破裂而成为与世隔绝的封闭体，在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这两大国家治理与发展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社会高度意识形态化，突出政治和对毛泽东个人的领袖崇拜成为最为明显的时代特征。

突出政治，是由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作为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所提出的，除去军事，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其后林进一步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总政专门编辑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全军官兵人手一册。<sup>2</sup>所以，突出政治和领袖崇拜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1963年在毛泽东号召下，全国开展向解放军学习，军队突出政治的一系列做法在全国得到普遍推广，城乡迅速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领袖崇拜蔚成风气，影响深远。

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思想单纯的青少年学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这一代青年生长在封闭而自成一体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的是单一而片面的革命理想主义教育，思想纯洁而头脑简单，充满自信又轻易盲从，持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却没有独立的主体意识，敢于挑战权威而又迷于崇拜领袖，具有

<sup>1</sup> 布鲁诺·德·梅斯奎塔、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独裁者手册》，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29页。

<sup>2</sup> 肖东连：《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下），红旗出版社，1999年，1145页。

热烈的革命愿望却缺乏革命正义的辨识能力，在报刊舆论和学校教育对毛泽东思想不遗余力的宣传影响下，他们对毛泽东的崇拜一如虔诚无比的信徒，任何毛泽东和与其有关的讲话、指示都有一种强大的感召力，都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1964年8月毛泽东与毛远新谈话，提到教育问题时说道：“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高教部转发了谈话纪要。同年6月毛泽东还对在北外学习的王海容说：遵守学校纪律的人“将来没有什么大作为”，鼓励学生违反学校纪律，造学校的反。<sup>1</sup>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流传到北京的一些大中学校，使一些正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学生激动不已，并按照自己对毛泽东谈话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开始以“造反”作为自己的旗帜，喊出“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1965年10月28日，清华附中学生骆小海在本班墙报上贴出一张“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内中写道：“造反，造旧世界的反，是历史的伟大动力。……拿我们学生来说，什么教育制度、学习方法、纪律规章、天地六合，都藏有旧的东西，对待它们，只有一种精神：造反！”<sup>2</sup>

毫无疑问，在文革序幕拉开之前，北京学生就喊出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口号，这反映了在阶级斗争学说灌输下，在毛泽东思想宣传影响下，青少年学生中存在着一种要求破旧立新的“造反”心理。这种“造反”心理，既是对现实存在的某种不满，也是对未来接班建功立业的一种渴望。

正是因此，当姚文发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大批判波澜，随着大批判的逐步展开和升温，北京市委4月中旬对“三家村”进行批判，毛泽东4月23日作出“各地区大学师生、中学教员和高中学生，都应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的批示，尤其是5月7日所做“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的著名的“五七指示”，这些思想敏锐、消息灵通的学生敏感到一场新的阶级斗争即将来临，他们就顺理成章地毫不奇怪地做出了下述一系列的大胆举动：

1966年4月，清华附中学生继上年之后再次向学校提出要求开展“小整风”运动，大搞阶级教育活动，被学校拒绝。5月，部分学生对校长所做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提出意见，认为报告没有强调这次运动的深远意义，没有强调突出政治，没有强调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假革命，学校不同意这些意见，并对此提出了批评。5月10日，学生写出《从我校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看我校是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校领导。5月20日，学生起草题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办学方向应当批判》的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系统汇报材料，其中写道：“我们目前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

<sup>1</sup>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134页。

<sup>2</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143页。

命深入发展的结果，这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下定决心，一届届、一代代和清华附中党支部的错误方向斗下去，……直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在清华附中真正地、骄傲地飘扬为止”。5月29日傍晚，清华附中卜大华、骆小海、张承志等十几位学生聚会圆明园遗址，为迎接阶级斗争暴风雨的来临，更有力地与校方斗争，一致同意成立红卫兵组织，<sup>1</sup>全国首个红卫兵组织因此而产生。受其影响，北京其他一些中学也相继成立红卫兵。他们发出誓言：“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sup>2</sup>

如果说清华附中学生挑战校方、掀起校园波澜是受阶级斗争观念和领袖崇拜双重驱动下的青春冲动所致，那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涌现出的校园风云则是部分教工与学校领导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因四清运动而积压的矛盾冲突所为。

1964年夏，以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工作队进驻北大进行社教试点，围绕校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的工作评价，学校形成支持与反对两派。工作队支持反对派，陆平遭到批判。但彭真和北京市委维护校党委权威，不同意工作队看法，张磐石受到批评而离开北大，由许立群取而代之。其后，包括聂元梓在内的一批反对派因此受到打压。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1966年5月。

5月19日聂元梓从北大党委传达的“五一六通知”文件中获悉中央文化大革命运动精神，<sup>3</sup>几乎与此同时，康生妻子曹轶欧带领到北大了解文革动态的工作组也透露了正在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及处理彭罗陆扬的一些信息。这对受压的反对派无疑是一种鼓舞，彭真的倒台，意味着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有了可能。聂元梓遂与哲学系几位教师商议，决定以大字报的形式，针对学校当前工作有违中央精神方向进行批评。聂向曹轶欧报告想法，获得支持。不过聂没有报告、曹也没有过问大字报具体内容。<sup>4</sup>

5月25日下午，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联名在北大校园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大字报如石击水，在北大校园引起巨大反响。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校园内就跟着贴出了一千多张大字报，开始多为支持聂元梓的，后来反对她的大字报占了多数。支持和反对的两派师生在校园中形成对立，在激烈的辩论中，甚至出现了推推搡搡的现象。一些人在聂元梓等贴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144-147页。

<sup>2</sup>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40页。

<sup>3</sup> 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17.html> 原载《往事》第四期，2004年11月。

<sup>4</sup> 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17.html> 原载《往事》第四期，2004年11月。

大字报的地方高呼口号：‘同学们，阶级斗争是复杂的，千万不要上当，不要重蹈 1957 年右派分子反党的覆辙！’”<sup>1</sup>事情非常巧合，1957 年大鸣大放时，北大的第一张批评性大字报也就是张贴在这里。北大党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对聂等贴的大字报进行了批评。聂等感到了压力。

6 月 1 日，在杭州的毛泽东从《文化革命简报》上读到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大字报针对上级党委的“造反精神”“正中毛泽东进一步从基层推动文化大革命进程的下怀”，<sup>2</sup>毛立即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地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并称：“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当晚八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全文播出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予以全文刊载，并配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文章（此前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新成立的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受命进驻报社后负责组织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于是，数天之内，“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像雪片似地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连连刊登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紧接其后，“北京五十五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科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sup>3</sup>

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进而清算以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经过半年多的精心运作与发动，由是勃然而兴起。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为发动倒刘斗争，首先通过组织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意识形态领域撕破口子，掀起波澜，引发大批判；继而以“剥笋”方式逐步清除被视为倒刘障碍的彭罗陆扬，将重要的党、军职权控制在值得信赖的追随者手中；随后遥控召开北京政治局扩大会议，表决通过“五一六通知”，使不无权力图谋的个人意志形成堂而皇之的集体决议。

在整个过程的初始阶段，一些人对文化领域的政治批判还表示过不同看法与意见，但随着斗争深入发展与组织人事清洗，毛泽东将这场斗争冠以“文化大革命”之名时，不再受到任何质疑与阻力，包括最高决策层的常委们都表示出支持与拥护。即便刘少奇在意识到毛泽东宏大叙事背后的权力图谋的情形下，也无可奈何地表现出了顺从。

这是毛泽东巨大的权威使然，也是个人崇拜的严重结果。这一情形覆盖了当时中国的整个社会。故此，当毛泽东需要进一步把文革战火从上层引向社会基层

---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 6，128 页。

<sup>2</sup> 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由来》，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17.html> 原载《往事》第四期，2004 年 11 月。

<sup>3</sup> 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 年，21—22 页。

时，北京校园应运而生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组织给了他这一机会，毛借题发挥，顺势而为，使文革迅速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群众运动。

2014/8/26 原刊于《领导者》2014 年第 12 期，总第 61 期

---

【热点研究】

## 罗瑞卿悲剧的历史原因

萧 象

罗瑞卿在文革前夕 1965 年 12 月的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是党内高层第一位因文革而倒台的蒙难者。

关于罗瑞卿被打倒的历史真相，在近半个世纪过去的今天，因了一些曾经显赫一时后又遭遇没顶之灾的文革高层人物回忆录的出版与研究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揭示，加上无远弗届的网络神奇传播，开始较为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

1962 年林彪患病、贺龙接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时任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罗瑞卿与贺龙以及中央一线的刘少奇、邓小平的接触开始趋于密切，其强悍的工作能力也深得刘少奇的欣赏，一度被视为下届的国防部长人选。

然而，这在党内高层矛盾斗争日益复杂激烈的 1960 年代，却引起了久蓄倒刘心计且视军权如命根子的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和不满，虽然毛并不怀疑罗的忠诚，但罗与刘邓贺关系的密切却不为毛所容忍。因此，作为实现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一战略部署之一步，罗瑞卿的工作缺点被着意放大，与林彪的纠结被巧加利用，罗首当其冲成了攻克刘少奇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外围障碍必须清除的第一个牺牲品。罗瑞卿被推上文革祭坛，不堪其辱而跳楼自杀，被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而罪加一等，自杀未遂而致腿残，此后经年备受批斗、监禁之折磨，饱经家破人散之苦难。

作为文革悲剧之一幕，罗瑞卿的蒙冤遭遇与所有文革受害者一样，充满了屈辱、辛酸、悲凉与苦难，具有命运悲剧的普遍性。但因其位高权重、身处中枢、又为最高权力直接打倒这一特殊性，其跌宕起伏的命运悲剧也就蕴涵着一般命运没有的特殊意味。从权高位重的显赫一时到挨批受虐的忍声吞气，诚为个体命运转化无常的荣辱之变，又何尝不是国家命运从治到乱盛衰之变的预兆，不是全体民族遭遇风暴陷入浩劫的先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罗瑞卿的悲剧与国家民族的悲剧有着难以分割的内在关联。因此，对罗瑞卿命运的关注，就是对国家民族命

运的关注，对我们自身命运的关注。

那么，罗瑞卿命运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悲剧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吗？

让我们先从当年的会议说起。上海会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军队高级将领共 61 人参加会议。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扩大进来的与会人员，事先不知会议内容。<sup>1</sup>会议进行两天后，罗瑞卿被召至上海，旋即被隔离，接受审查，没有给出任何申诉辩护的权利机会。

一个本由七人组成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的会议，将与会人员扩大到九倍，内容只为整肃批判罗瑞卿一人，而大多数常委却事先不曾与闻。这明显一反常态，有违于党的会议规范与程序正义（如果中央曾经制定过相关的会议规范的话。如果没有，则说明这一方面存在着漏洞）的做法，姑且存而不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常委们的会上表现则耐人寻味，大可考究。

据罗瑞卿女儿罗点点所著《红色家族档案》引述《康克清回忆录》：会议之后，朱德心情不畅，哀叹道：“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sup>2</sup>朱德尚抱这样看法，关系密切的刘邓更当如是。那么，拥有举足轻重话语权的多数中央常委们，当毛抛出罗的问题，决定打倒罗时，为什么不为罗说话，施以援手，而听之任之呢？就是一般的同志，在受到不公待遇，遭遇不实指责与诬陷时，也应给予起码的公道，何况刘邓与罗之间还有良好的私谊。

这不能不令人感到困惑并为之遗憾。尤令人困惑和遗憾的是，在随后北京召开的批判大会上，所有的同志一夕之间反目成仇，流露出“十分敌视的目光”，罗瑞卿不堪忍受而跳楼自杀，刘少奇、邓小平以不屑的口吻评说道：“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刘）“就像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邓）叶剑英则诗兴大发，改辛弃疾《贺新郎》词讥讽道：“将军一跳身名裂……”以为批判。如果说叶剑英多少有些幸灾乐祸是叶与罗往日积怨的情绪发泄，虽不可取，尚可理解，那么刘邓言辞间的冷漠与嘲讽就实在让人惊诧莫名，而难以理喻了。

同情与悲悯是人类的基本情感，也是人道与人性的具体表现。正是因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感存在与人道施行，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才使人类社会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那么，为什么我们共和国这些最杰出的共产党人在 1960 年代的文革时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 6），28 页。

<sup>2</sup> 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的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 1999 年版第 193 页。

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与悲悯呢？为什么他们对待自己蒙冤受难的同志会如此的冷漠无情呢？是什么原因、在什么时候使得宝贵的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从他们身上流失了呢？

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讲述的有关罗家的故事，或许为我们寻找这一答案可以提供某种历史启示。1942年，为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冀南军区负责人宋任穷找到时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的妻子、河南女青年郝治平介绍家里的关系。与家人失去联系多年的郝写给父母一信，宋派人将信送至郝家。其后，只要八路军找，郝家都尽力帮忙，郝父多次赶羊到敌占区，换钱后买药给八路军。翌年也就是1943年，郝母赶到太行山探女，将郝1岁女儿领回老家带养，六年后又送回解放区，适逢解放区土改，郝不得不动员母亲回家，以免有让地主成份的母亲躲逃土改的嫌疑。当时交通极不方便，两地相距遥远，郝母又是小脚，往返途中其艰辛不难想见。文革中郝父母以地主身份被赶出京城驱回老家，郝父不堪其辱悬梁自尽。

将自己从遥远家乡送来抚养了六年女儿的小脚母亲再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诚然是服从革命大义的需要，显示了与地主划界的思想觉悟，但觉悟划界的同时，却划痛了善良母亲的慈心，让亲亲人伦受到伤害。对一位曾经帮助过革命的开明进步的小地主进行批斗，并扫出京门，当然是为了维护革命首都的安全和纯洁，表现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但革命毫不留情的决绝的同时，何尝不是对当年恩义遗忘的绝情。

如果说罗家故事或显轻微，不足以说明问题，那么下述发生在周恩来身边的故事当扣人心弦，发人深思。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给革命造成重大破坏和威胁，上海地下党决定实施报复，周恩来深夜带领特科组潜入顾家，适顾妻正与一帮人搓麻将，其中一人叫斯励，是周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1927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时周恩来被拘留，正是此人释放了周。为不走漏风声，当时在顾家之人，除顾家一7岁女孩为周护卫外，包括斯励在内10数人全部遇害。同年6月，地下党员黄慕兰获悉向忠发叛变，第一时间向潘汉年报告，使周恩来等重要领导得到及时安全转移，事后周十分感激地对黄说道：“你们是党的一支奇兵，党是不会忘记你们的。”20多年过后，潘汉年案发，黄慕兰受其牵连，有关人员将有关部门准备逮捕黄的消息报告周恩来，周沉思良久，一声长叹，无以言复。<sup>1</sup>

在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白色恐怖年代，革命的极端性与残酷绝非未亲历者所能想象。在秘密行动中对叛徒不谙人事的无辜女儿做到手下留情，折射出严酷年代周恩来身上人道主义的难能可贵，但同时对救命恩人不能网开一面，却是铁的

---

<sup>1</sup> 吴基民：《周恩来与上海灭门惨案》。

革命纪律所要求的决绝与无情的表现。这种决绝与无情是由于白色恐怖状态下的迫不得已，情或可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和平时代，对于有功于革命事业同时也有恩于自己的同志的蒙冤，噤如寒蝉，莫可奈何，又该如何解释呢？

中共党内周恩来素以最具人情味而为人称道，又以最讲原则而令人钦佩。而问题的症结恰恰也就在此。“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中共铁的组织纪律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早已内化为周恩来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则。黄慕兰为潘汉年案所牵连，而潘案为最高权力所钦点，因此，尽管周恩来明知黄为冤枉，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准则的限制与约束<sup>1</sup>，不得不选择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而对黄的冤情听之任之，视若等闲。这就是说，在服从和维护最高权力这一原则约束下，周恩来不得不放弃了对黄慕兰可能的救援。

在这里，我们接触到了一个重要的也是核心的政治命题，这就是，一个政权最强大的地方往往就是它最弱小的地方<sup>2</sup>。其中的原理与人们常言一个人的长处往往就是他的短处有同工之妙。毛泽东曾将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归功于“三大法宝”，其中之首为“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归根结底就是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这是中共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和较短的时间里能够崛起于 20 世纪的中国政治社会舞台，打败国民党，建立全国政权的原因所在，也是超越和压倒于其他政党的强大所在。然而，正是这铁一般的党的组织与纪律和高于一切的党的核心领导，指引它的成员在毫无条件地执行党的指令、英勇决绝地进行政治行动，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时，也限制了党员自由意志的发展和独立思想的能力，约束甚至消解了党员乃人的人之常情。在进入和平年代，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之后这一情状更显突出。

以此为观照，刘少奇、邓小平所表现出的对于罗瑞卿的态度问题则迎刃而解，原由亦昭然若揭。罗瑞卿突遭整肃，刘邓内心并不认同，但却以默然的态度予以接受，没有表示任何的异议，因为这同样是党的最高权力毛泽东做出的打倒决定。虽然刘邓与罗平时有着良好的私谊关系，对其工作也颇为赏识，也虽然明知毛的这一决定包含着错误，但受到政治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也就是受到限制与约束，在可能的仗义（直言与抵制）与服从（隐忍与执行）之间，选择了服从。“服从”这一政治行为准则起到了控制刘邓政治行为的作用，使其在服从最高权力的同时丧失了应有的正义和情义。此与周恩来对于黄案的态度如出一辙，都是党的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

除此之外，另有一层历史因素，那就是建国以来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出现的思想分歧进入 1960 年代后开始呈现出尖锐的冲突态势，最近的一次冲突就发生

---

<sup>1</sup> 参见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sup>2</sup> 邹说：《二十世纪中国政治》。



在 1965 年的年初，毛泽东以邓小平和刘少奇不让他参加会议和在会上发言为由大发脾气，甚至对着刘少奇说出“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sup>1</sup>的威胁话。党内这种日趋激烈复杂的矛盾斗争使刘邓不会不感到一种沉重的政治压力，因此，对打倒罗瑞卿的认同，除了服从的表示之外，还有一种难以明言的向毛输诚以自保的意味。随着批罗斗争的深入，也随着文革序幕的拉启，刘邓的压力越来越大，自保的意识也就越来越强，仅是一般的表态已无济于事。于是，在罗瑞卿自杀而罪加一等时，刘邓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与嘲讽言说，既是基于党内对自杀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这一残酷认识所做出的带有批判意味的条件反应，又是借机划清界限与撇清关系的切割表示。以疾言厉色和态度绝决来表明自己与被打倒者不同的立场，是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屡见不鲜的一贯做法，目的仍不出表现对上级的服从与紧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判断：由于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以及对毛泽东权威的畏惧，使得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这些高层领导在毛泽东做出打倒罗瑞卿这一错误决定时，没有做出应有的抵制行为，不由自主地选择服从并执行了这一决定，以致罗瑞卿后来的不堪其辱跳楼自杀。这种严格组织原则制约下的不由自主所产生的政治行为，不仅令政治正义轻易蒙尘，使人道仁义趋于丧失，也为悲剧的发生打开了方便之门。

虽然罗瑞卿是被突然打倒，但其悲剧的发生却并非突如其来。回望历史，我们不幸地发现并可以肯定地说，在 1940 年代罗瑞卿妻子有违常情将自己来自遥远家乡的小脚母亲劝回故里，接受土改改造之时，在 1950 年代周恩来有违常理对有功于革命也有恩于自己的黄慕兰冤情袖手旁观之际，甚至在 1959 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遭批斗罗瑞卿不留情面的表现之中，决定罗瑞卿悲剧发生的因子就已经种下。我们进而不幸地发现，当刘少奇邓小平在上海会议上对打倒罗瑞卿不置一词，表示服从，在北京会议上对罗瑞卿自杀冷嘲热讽时，他们自己的被打倒已近在眼前，他们也就是在不自觉地为下一个更大悲剧的发生充当推手。

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一则流传甚广的西言：“起先他们屠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后来他们屠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依旧不说话；然后他们屠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还有更为悲哀的发现，悲剧发生的历史逻辑链条并未因文革的结束而断裂，因一位具体的最高权力者的谢世而终结，到了 1980 年代，进入后文革时代，历史的逻辑链条仍在延续，因而悲剧仍有发生。极具警世意味的是，罗瑞卿、刘少奇等文革悲剧是由于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服从”而导致，80 年代末的悲剧恰恰就是因政治行为者对最高权威的“不服从”而产

---

<sup>1</sup> 王光美、刘源等著，何家宽编《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18 页。

生。这看起来像是互为矛盾的悖论，却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向人们揭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最高权力的无以撼动，而这一真相背后潜伏着一个人们极不愿意看到却又不得不承认的深刻又残酷的真理，这就是：一种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

真理有时确实残酷，但它却让人们对一种现象的认识直抵现象的本质。无论是“服从”还是“不服从”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最终都将导致一种历史悲剧的发生，毫无疑问，无以撼动的最高权力就是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那么，为避免悲剧发生的惟一办法就必须要对最高权力进行“撼动”，也就是进行制约。我们愿意从中国古训旁观者清的意义上来援引美国研究中国文革问题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的一个深刻观察作为证明。麦氏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论及罗瑞卿悲剧事件时敏锐地指出：“如果有一个理想的状况，让在场的与此事无关的政治局常委们——刘少奇、周恩来、人大委员长朱德元帅、邓小平团结起来，再加上彭真（即使级别与前几位不同，他的影响也相当大），告诉毛他们不赞同这样的诬陷，那么这就是理想的状况了。”“这是这群强有力的人物团结起来制约主席的最后机会”，“但是，他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政治局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也就是最高权力没有得到约制，以至于放过了可以不让悲剧发生的“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之所以“理想状态”这一历史机会被放过，之所以常委们没有正常行使职权对毛泽东的错误决定进行抵制，没有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是因为前已论及的党内严格的组织原则对党员政治行为的限制与约束所造成的结果。

历史不止一种选择，悲剧并非不可避免。要避免历史悲剧的发生，就必须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对最高权力进行制约，就必须有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对限制与约束党员政治行为的组织原则进行反思与改造。这是我们对罗瑞卿悲剧历史原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也是这一悲剧给我们留下的沉痛教训和深刻启示。

2011-7-28 首发于共识网

---

## 【热点研究】

# 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萧 象

中央高层文革蒙难的幸存者中，陆定一可谓蒙冤时间最长、受难程度最烈者。

从1966年5月文革伊始被打倒至1978年12月获得平反与自由，前后长达十三个年头。在此期间，陆定一经历了个体命运跌宕起伏的荣辱丕变，受尽关押监禁、刑讯拷打之苦，饱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痛。这段炼狱般的悲惨遭遇堪称一段血泪交加的个人痛史，也是国家十年浩劫的一个缩影，给世人留下的除了沉重记忆的不堪回首，更有永记难忘的历史教训。

1965年底至1966年初的中南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尚昆被调离北京，罗瑞卿遭受整肃，彭真受到批判，这一连串事件显示毛泽东在为文革发动做好了最后的准备。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标志性的“五一六通知”，文革战火正式点燃。就是在是次会上，陆定一与前述三者被捆绑在一起，被指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分子而撤销职务，黯然下台。

关于陆定一在文革刚开始即中箭落马或者说被打倒的原因，1988年10月陆定一在回答项南这一提问时说道：“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陆定一自认为被林彪打倒的这种说法，一直以来代表了有关文革历史的主流观点，成为一般文革叙述的典型表达。

然而，在文革研究得益于互联网的神奇功能而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这一说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文革历史稍做涉猎，就不难发现，陆定一所以被打倒，其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一案的因素，也就是林彪可能施予的影响的确不可忽视，但至为关键的却是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在发挥主宰的作用。众所周知，姚文元衔命所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投石问路的一种试探，而此文1965年11月在上海发表后在北京的冷遇，中宣部所表现出来的有意无意的冷漠，意味着毛泽东倒刘战略意图在中央贯彻的受阻，使得毛泽东对陆定一及其中宣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在毛看来，陆定一成了前进路上非移去不可的绊脚石。于是1966年3月中旬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宣部明确提出警告，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1962年因犯错误而被撤销），3月下旬毛进一步发表讲话，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其后遂有“阎王”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被解职打倒。

如果仅从权力管理与人事变更这一微观层面而言，陆定一的被解除职务似并无不当。在前民主社会，最高权力一旦确定，其他所有权力均由此而逐级派生，按照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一定律，派生出的权力所面对的，也就是所要负责的是上级权力。因此，当最高权力发现不能如臂使指般调度下级权力之时，及时果断地撤销或收回下级的权力，毋宁是明智之举。倘若事情仅止于此（陆被解职），问题自然也算不上如何严重，充其量不过一次人事变更的“茶杯风波”。因为任何时代都有朝廷命官因事获咎，这些获咎的官员或贬放地方，或降职使用，或归隐田园。这是政坛司空见惯的一种常态，也是古今贯通的政治传统，与百姓生计

无关大旨，与社会运转无大影响。

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逸出人们可能的料想。由于毛泽东超乎常人想象的宏观战略，由于这宏观战略的指导思想，政坛常态被打破，政治传统遭抛弃，一次有可能正常的权力更替演变为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动荡与民族浩劫。作为整个历史场景组成的序幕，涉及陆定一的此次人事变更，“茶杯风波”发展成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惊涛骇浪，问题也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陆定一始则被软禁，写检讨，随后是戴高帽、挂黑牌、受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因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sup>1</sup>。最后，陆定一于1968年4月未经审判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因写申诉惹恼专案组，“被第二次戴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戴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sup>2</sup>

这就远远超出人事变更的可能范畴，而成为地地道道的人身迫害了。在前引文章和书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是作为陆案的决策和指使者而出现的，这让人们把愤怒与谴责的目光聚焦在了这些声名已裂的人物身上。的确，在陆案形成与审查过程中，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陆定一“政变”，并发出“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的威胁，康生也以“陆定一是特务”进行过诬陷，陈伯达则在接管此案时做出了“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这样十分不近人情的批示。他们的言行对陆定一后来的遭遇无疑有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若就此遽然得出“坏人迫害”的结论，又未免仓促，既偏狭且肤浅。据邱会作回忆，在同一次会上，周恩来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sup>3</sup>而《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也提到“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陆案做过三次指示，一次是1966年7月：“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一次是1976年2月：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最后一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按照现行政治规则，

<sup>1</sup> 韩宗平：《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

<sup>2</sup> 陈清泉：《在中央高层五十年——陆定一传奇人生》，网传pdf版，291页。

<sup>3</sup> 《邱会作回忆录》，439页。

这位被隐其名的“中央有影响的人物”当然是受到尊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特此也，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了陆定一党籍。此时林彪、陈伯达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虽“四人帮”结盟在朝，但邓小平业已复出，与周恩来、叶剑英等手握重权，主持朝政。在许多老干部获得了解放之际，中央反而对陆定一做出更为严厉的处置（此时周恩来重病住院，据《周恩来年谱》，同日邓小平前往医院探望，具体内容未载，可以推测与此决定不无关系）。

以往人们论及陆定一案，多以1966年5月会议决定为焦点，而避而不谈1975年11月会议决定。其实，某种意义上，1975年的决定更能反映陆定一遭遇的实质。如果说1966年5月的会议决定由于文革初期的乱云飞渡与严慰冰匿名信的案发，多少受到某种气氛与情绪的影响，那么，1975年11月会议，没有了这些因素影响，仍做出这一决定，而这一决定实质是判处陆定一的政治极刑，这对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并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的陆定一，有如忠孝之子被冷酷无情地逐出家门，所带来的打击与伤害，比较先前的打倒和刑讯逼供的皮肉之苦，更为严重。陆定一宁肯坐牢也拒不接受这一决定的悲愤反应，足以见出打击之大，伤害之深。

一直以来，人们对发生在文革中某一政治行为进行评判时，往往以政治行为者后来的政治结局来反证当年的政治行为，以此来说明当年政治行为的邪恶是行为者本身邪恶所致。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道德评判方法在陆定一案面前露出了马脚。陆案显示，不仅是林彪、康生、陈伯达，还有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周邓是两次会议的常委，叶是后一次会议的常委）也都是陆案的决策者，参与了对陆定一的“天下围攻”。例如，林彪对陆有过恶语相胁的愤恨，周恩来也有过砸缸掷陆的恼怒，陈伯达做过“降低生活标准”的批示，“中央有影响的人物”也下过“搞他个里通外国”的指示。二者之间看不出有何本质的区别。

依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判断：一种政治行为所以如此发生，主要是决定于政治行为者的政治角色而不是个人品格。

这一判断使我们进而肯定地说，陆定一案亦即陆定一的文革遭遇，是为中央高层集体行为所决定，而不是某某个别人物所造成。

这就不仅动摇了“坏人迫害”的似是而非说法，提供了文革观察新的视角，也让我们从“奸佞乱朝”的迷惑与纠缠中抽出身来，把追根究底的目光投向“天下围攻”的行为本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陆定一“天下围攻”这一现象，发生使陆定一被打倒之后陷入更悲惨境地这种行为呢？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依据列宁这一经典说法，理论指导行

动，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行动，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行动。之所以发生“天下围攻”的现象与行为错误，是因为作用于这一行为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

众所周知，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立党学说。阶级斗争强调区分敌我，鼓动阶级对立，突出事物的矛盾面，宣扬人的阶级性。在生产十分落后、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当低下的时代与环境中，它激发人的阶级意识，唤起人的仇恨力量和造反精神，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因此，它成为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的一件法宝和用以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的一大利器。然而，一定的理论学说都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都离不开时代与环境的制约性。武装斗争与和平建设，是两种不同时代与环境下的社会实践，武装斗争依靠阶级仇恨冲锋陷阵，和平建设需要人间和谐维持稳定共建家园，不同的社会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转换与观照。这是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也是时空转换带动事物利弊转换的辩证关系。

可是最讲辩证法的毛泽东偏在此处醉眼朦胧，陶醉于武装斗争巨大胜利带来的无边自信中，不识战争与和平的时空转换必定带来阶级斗争利弊转换的“庐山真面目”，却因了天生好斗的个性，对阶级斗争青眼有加，建国后依然奉为法宝，作为国家建设的治国纲领。进入 1960 年代，在党内激烈矛盾和国际复杂局势双重刺激下，过度反应，自以为是，更把阶级斗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全党全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社会确分阶级并发生斗争，人间自有矛盾并存在冲突，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证明，阶级斗争可以通过调和得到化解，人间矛盾能够自我平衡消融。作为夺取了政权的执政者，治政的主要方针应是通过安抚各方，发展生产，依靠法治，维护稳定，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继续强调对立，灌输仇恨，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很不幸，毛泽东不谙此道，且反其而行之，于是，阶级斗争这柄革命年代克敌制胜的莫邪宝剑，在和平时期就变成了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所照之处，莫不都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牛鬼蛇神。而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宣传灌输和耳濡目染，属下治下如同喝了狼奶，无不绷紧着阶级斗争这根弦，以阶级划线，以斗争为纲，变得仇恨满怀，冷酷无情，一旦运动来临，号召发出，面对揪出打倒的牛鬼蛇神，更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一泄满腔怒火而后快。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涉世不深的红卫兵还是忠于职守的专案员对陆定一是那样的心狠手辣，铁石心肠。与其说他们是在对陆定一进行非人折磨，毋宁说是在革命义愤驱使下对“黑帮”、“反党”分子施予阶级惩罚（文革时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在《问史求信集》中反思其当年撰文“在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感到“‘理直气壮’、坦然为之”可为佐证），并

以此为表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的捍卫效忠。

也就是为什么中央高层对陆定一的处置是那样的铁面决绝，毫不留情，毫不客气。这固不排除权力场上个人恩怨、挟私泄愤、幸灾乐祸、落井下井、投机取巧等诸多人性恶劣因素混入其中，但更多则是阶级斗争理论武装下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贯做法。与会者或政治行动者遵循最高权力的旨意，按照绝对服从的党组织原则，抓住陆定一的缺点和工作失误，任意放大，无限上纲上线，以此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证明，一方面显示对最高权力的效忠与紧跟，一方面表示对“阶级异己分子”的划界、批判与不屑。

至于陆定一打倒之后的悲惨境遇，则可从当年盛行一时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与“痛打落水狗”的话语主张中找到某种理论支撑，而这一支撑通向的仍是阶级斗争的大本营。“宜将剩勇追穷寇”是毛泽东抒发战争胜利情怀的名句，“痛打落水狗”为鲁迅思想文化论战的名言。把战争对敌的奋勇精神移用于对待自己的同志已是错乱，将鲁迅时代文化领域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用于政治社会斗争更是乱套。“痛打落水狗”本代表一种鲁迅精神，在鲁迅时代无疑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然而，鲁迅时代言论较为自由，不同观点可以辩驳交锋，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另有林语堂等一方提倡“宽恕”与“宽容”。两种观点，各树一帜，读者自认亲疏归所，社会思想由是折中调和，达致平衡。但在言论一律的1960年代，从鲁迅时代文化思想领域诸多不同观点中，独取其一，用于政治斗争，没有了同情、宽容、仁慈、悲悯这些人间最基本也最宝贵的人道主义元素的中和平衡，社会思想与行为发生倾斜，而走向极端的绝决，变得冷酷无情，实为必然。

因此，即便最杰出的党的领导人也对自己昔日生死患难的同志、战友表现得毫无宽容，毫不手软，在其被打倒之后更做出包括将其投入监狱和使其绝望的逐出教门等系列无情行为。阶级斗争利剑伤人，此处最见锋芒。

陆定一出身于无锡殷实官僚家庭，1925年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一千元给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零钱，留为治病开支。因此之故，后来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严厉处置。在手握重权的党的领导看来，这种铁面严厉或许正是显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与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维护纯洁与追求彻底的另一面，是没有宽容的排拒，是走向绝决的极端，是充满冷酷的无情，而这恰恰就是革命业已走进死胡同，不得不要转身掉头的前兆与征象。

文革的悲剧性收场即为最雄辩的证明，而后来80年代末广场悲剧的发生也不能不说与此种“没有宽容的排拒”与“绝决的极端”革命性有着某种令人心悸的幽暗关联。

对陆定一而言，背叛家庭而投身革命，把家留的私款捐作党费公款，本是高标的义举，反成获咎的罪状，信而见疑，忠而被弃，天下悲哀莫过于此。

在毛泽东何尝又不是悲哀！对一位在关押之中仍表忠心“不能跟着走，爬着也要跟上去”（陆定一狱中上书语）的忠贞旧部不予宽宥，最终只能是落得形影相吊、孤家寡人的凄惨结局，平生自谓两大功业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与其一道身后即被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果以阶级成分论，中央高层纯正地道工农出身者又有几人？就连毛泽东，论出身即便打上一半折扣，能够合格还是问题。既如此，严苛他人，以作莫须有罪名的藉口，足以见出阶级斗争观念的笼罩，同时，也未尝不表明没有反躬自省与自知之明的权力的危害与虚伪。

除了培育发展人的仇恨、挑动人间互斗、败坏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外，无视法律，消解法治，是阶级斗争理论树上所结又一恶果。阶级斗争一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下的阶级专政，既为党的领导，又是阶级专政，以司法独立为征象的法治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功能。司法不独，法治不立；法治不立，人治彰显；人治彰显，正义趋于流失；正义趋于流失，则冤假错案与社会动乱不可避免。所以，公安机关甚至不是公安机关都可以随便抓人，不经司法审判，可以任意关押监禁，且美其名曰“群众专政”。陆定一之被非法批斗、关押、囚禁，祸根乃源自于此。党领导下的阶级专政，一突出特点是以需要为目的，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大局。因此，它常常遵循领导旨意或意图，立案审查，先抓人再找证据，没有证据就逼供虚构，是故，极易沦为陷构忠良、迫害无辜的工具，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场。陆定一被关押，是为了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需要”；被监禁，是服从并服务于文化大革命“大局”，以此证明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必然与必要。可以说，就是在这一“需要”与“大局”名义下，陆定一被架上文革的祭坛，成了牺牲品。

文革后包括陆定一在内劫后余生的中央高层痛定思痛，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果断中止这一理论，转而将治政目标转向经济建设，中国才有别开生面的今天。中央高层抛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群众专政”的厉害心存余悸，正确地将“群众专政”一并抛弃。然而，囿于传统认识，在实际中，抛弃的只是“群众”，而对“专政”依旧情有独钟。殊不知，司法所以不独，法治所以不立，冤假错案所以迭出不止，原因不在“群众”，而在“专政”，“群众”只是装饰前缀，“专政”才是实质根本。文革之后的80年代，高层同样有无罪而不得自由者，没有“群众”，照旧“专政”——被非法监禁，以至终身。“专政”对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的隐形危害，有如“斗争”对世道人心与社会和谐的明显破坏，惜乎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深刻反思，是遗留于今日的最大遗憾。



文革结束已 35 载，陆定一离世也 15 年，但陆定一文革遭遇给世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无疑是极为深刻而惨痛的——一场有可能正常进行的权力更替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与民族浩劫，一次充其量不过人事变更的“茶杯风波”发展成骇人听闻的人身迫害——需要人们不断地深入反思，永记不忘，以防悲剧的再次发生。

最后，需要回应陆定一何以自认为被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所打倒。这或许是对前者恨之切而对后者爱之深的缘故。中共第一代高层对毛泽东多有一种无法释解的领袖崇拜情结，因此对诸多关涉毛泽东的问题不能看得真切，苏东坡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此之谓也。

2011-10-9 首发于共识网

---

## 【热点研究】

# 从分歧走向分裂——毛泽东倒刘之史迹考察

萧 象

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共和国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

一直以来，围绕毛泽东为什么要打到刘少奇，废黜自己的接班人，人们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史料在不断地进行思考。因毛泽东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有“联想到 1962 年”的指说，人们多将毛刘分歧归始于 1962 年。其实，早在建国初始毛刘关于治国方略分歧已现端倪。根据近年资料显示，毛更于 1953 年时即动了将刘“挪位”亦即“废储”的念头，只是由于高岗事件的意外发生，才按兵不动，隐忍未发。这看起来使本已众说纷纭的案情更显复杂，但恰恰因它的出现，打开了一条通道，使人们豁然开朗，对毛刘冲突可以获得更为深刻的洞察。沿着这样的指引，我们试图走近这节不算久远却已尘封的历史，循着斑驳隐微的史迹，寻求自以为是的历史答案。

## 一

远在中共登上历史舞台初始的 1922 年，毛泽东就与刘少奇这位相距不远的湖南老乡有了结交并建立起革命友谊。遵义会议之后这种革命友谊发展成一种政治

联盟，正值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将党的最高领导权从张闻天麾下转移至自己手中的重要时期。成为中共实际掌门人之后，为进一步巩固、扩大权力，把全党思想统于一尊，实现以“道”治天下的宏伟抱负，毛泽东在延安发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风运动，将刘少奇从华中前线召回身边，委以重任，辅助领导开展整风。刘“以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立即进入中央书记处，成为在地位上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号领导人”。<sup>1</sup>

毛泽东选择刘少奇为搭档，一方面是对刘少奇政治才干、能力和水平的赏识，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不遗余力地支持和推崇也是一重要因素。“在七大以前，毛泽东还没有这么高的威望，是你的父亲和其他领导人协助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sup>2</sup>几十年后王光美对女儿说出的这段话可谓这一背景的注释。刘少奇进入中央书记处不久便顺势而为，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政治局遂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毛泽东就此成为政治局主席并获得“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至高权力。

从此毛泽东开始了与刘少奇长达二十多年互为搭档的政治生涯，中共也由此形成延安以后一以贯之的毛刘配的政治模式。毛刘搭档的政治模式是中共革命年代的历史产物，同时由于中共革命由苏区根据地和白区地下党两大部分相组成，而毛刘分别为苏区和白区的代表，又具有革命年代的代表性。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在《毛泽东最后的革命》一书中提出，毛刘个性截然不同，毛是一个浪漫的革命家，醉心于斗争和军事行动；刘则有点书生气，喜欢沉思，但是坚定不移，坚忍克己，因而认为刘毛搭档为一“奇怪的组合”。但正是“这一奇怪的组合”却显示出了令人称奇的坚强与所向披靡，中共在其统领之下，不出数年，便横扫敌手，一统江山，夺取了全国政权。

然而，这对战争年代的黄金搭档，在和平时期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像人们指出的那样，战争年代的坚强合作并不保证和平时期的牢不可破，砸烂旧世界时的思想高度一致更不代表建设新世界时依然如此。战争与和平，革命与建设，乡村与城市，打江山与坐江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存在与政治治理方式。伴随着时代与环境、身份与权力的巨大改变，毛泽东和刘少奇，面对一个对他们来说完全陌生的新的社会存在，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型国家建设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他们表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思想倾向与观点分歧。

分歧不是因为未来国家的路向选择——在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这一目标确定上毛刘两人别无二致，而是在对这条道路建设的国情判断、方略设计、政策选项与步骤安排等问题上，刘少奇出现了与毛泽东不尽相同的看法。

1949年春，刘少奇在刚解放的天津视察时认为：“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

<sup>1</sup>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网传 pdf 版，92、94 页。

<sup>2</sup> 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11 页。

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利于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翌年初，刘少奇与安子文等谈话，就东北局关于农村党员雇工问题作出指示：“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太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因此现在的农民党员是可以单干的，我们的党规党法上允许党员单干而且也允许雇工，认为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思想。”1951年3月，刘明确提出，党的任务“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同年7月，刘还对山西省委有关老区互助组的一些左倾作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sup>1</sup>

显而易见，在刘少奇看来，由于中国社会生产力落后这一历史现实条件，在进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需要一个允许私有资本主义存在的过渡时期，不能过早地动摇和削弱私有制基础。刘的看法与主张在60年过后的今天仍不失睿智的光芒。其实，这并非刘少奇个人的思想发明，而是中共中央确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贯彻落实，与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下述一段讲话精神一脉相承：“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

然而，由于为49年革命提前到来的巨大胜利和经济快速恢复的喜人成就所鼓舞，毛泽东那种浪漫的农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被极大地激活，毛泽东很快就放弃了新民主主义路线，改变了原来的看法，提出一种完全否弃资本主义的激进想法——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此，不合节拍的刘少奇的言论自然受到毛的批评与否定。

薄一波回忆，毛泽东从高岗手中得到刘少奇与安子文的谈话记录后，“批给陈伯达看，对少奇同志的不满，形于颜色。”<sup>2</sup>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更于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刘少奇等“确保私有财产”、“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右倾思想公开进行严厉批评。

虽然刘少奇接受了批评，做了检讨，很快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看法和态度却由此发生了改变，在毛眼中，刘少奇由延安时期正确的左派代表变成了如今“不能让人放心”的“左右摇摆”的人物。

1953年5月19日，毛泽东给中办主任杨尚昆发出指令，命其检查未经他看过即发出的电报和文件，指责“过去数次中央会议决议不经我看，擅自发出，是错误的，是破坏纪律的。”并申明：“嗣后，凡用中央名义发出的文件、电报，均需经我看过方能发出，否则无效。”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毛态度之严厉，用词之峻切，为1949年以来所少见。

史家多有认为，建国后毛泽东以君王自居，视与刘少奇、周恩来等平等的同

<sup>1</sup> 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二，11页。

<sup>2</sup> 薄一波：《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忆》，198页。

志关系为尊卑的君臣关系。依此，在权力关系上，毛刘之间所表现出的实质也就是中国传统社会君权与相权的现代演绎。毛泽东此处君威初露即严，其后，多以君权凌相权，致刘等常处小心翼翼。毛对刘的批评指责，诚为对刘工作的不满，又未尝不是要求权力无限与至高无上的君权同循规蹈矩的相权牴牾冲突的一种表现。这种表现贯穿于毛刘矛盾斗争过程的始终。

毛泽东还多次在与高岗的交谈中流露出对刘少奇的不满，认为“‘七大’以后把刘少奇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少奇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不能让人放心”。<sup>1</sup>

不惟如此，更为严重的是，毛泽东甚至密嘱高岗：“亲自去沈阳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20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后的表现。”<sup>2</sup>东北局第二书记张秀山回忆：

“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主席让我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况，要我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陈云说过。我又问，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上报的。”<sup>3</sup>毛泽东秘密调查刘少奇历史，这就不只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可为解释的了，而是意味着毛对刘的信任与忠诚产生了动摇与怀疑。

在此背景下，1953年夏秋期间全国财经会议上出现的“批薄射刘”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生的“讨安伐刘”风波，就不是无中生有的空穴来风，也不是简单如流行所言为高饶别有用心的政治图谋，而是其来有自，是建国后党内出现的苏区和白区宗派情绪的借机发泄，更是共和国史上毛刘思想分歧引起信任危机与权力重新布局这一复杂斗争在次级层面的投影。

前已提及中国革命由苏区武装斗争与白区地下组织两部组成，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战争时期，苏区与白区的党组织，遥相呼应，互为支持，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但进入民主建设的和平年代，这一历史存在不幸变成了一个宗派性质的敏感问题。打江山同甘共苦，坐江山勾心斗角，这是套牢中国传统社会农民起义的一个怪圈，中共领导的红色革命不幸仍未能摆脱这一阴影。这一建国后冒出的宗派问题成为影响中共党内团结、破坏党内机体健康的一大暗疾。当初共和国定都北京，北京乃刘少奇领导的华北局工作旧域，其中坚干部大多地域情况熟稔，长期工作在城市，有较多的城市运作与管理经验，故此，中央机构组建华北局人马得近水楼台之便利，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更是受到重用，位居中枢，既为自然，也有其必要。然而，却引发一些戎马倥偬的军中将领不满，认为打下的江山被他

<sup>1</sup> 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二，299页。

<sup>2</sup> 赵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44页。

<sup>3</sup>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东北到西北》，321页。

人捷足先登，对白区党颇有怨忌。这些怨忌日积月累，在这两次会议上借批评薄一波、安子文工作失误之机会而得以发泄，形成“批薄”、“讨安”之局势。然而，“批薄”、“讨安”只是“项庄舞剑”，目的却是“意在沛公”，也就是“射刘”、“伐刘”。

“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手上，而不在我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由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经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sup>1</sup>

这是毛泽东对高岗、张明远的一段谈话。如果说毛泽东是在以批评谭震林的方式反说正解，要把人们引向一个问题，那么会议期间因病在北京西山疗养的林彪对一些军中将和领导地方大员前来看望他时说的一句话，以及王鹤寿事后就此的一番评论无疑就是单刀直入，挑开了这一问题。林彪说：“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王鹤寿说：“林总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刘少奇是不行了”。<sup>2</sup>

“两个司令部”、“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这些文革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用于打倒刘少奇的词语，1953年就出现在毛泽东和中央高层干部的话语中，很可以说明当时这一问题的实质存在与严重程度。如果联想到1953年正是中共为八大召开进行人事酝酿的准备时期，那么这一年内接二连三地出现一系列不利于刘少奇的事件，就绝非偶然，是大有文章。

但如果就此得出毛泽东此时就有倒刘想法的判断，恐又为时尚早。毛对刘信任不再，已起疑刘之心，还未见生倒刘之意，至少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史料可为证据。毛只是在权力平衡的层面作政治的考量。权力平衡乃政治之大道，毛泽东自是深谙此道，当年选择刘少奇就不无这一因素的考虑。如今当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呈“坐大”之趋势，将影响这一权力平衡格局时，不能不触动他的隐忧与警觉，而来自军中的强烈不满更是加重了他的担心。与刘少奇的思想分歧和权力平衡的政治考量，两种因素叠加使毛泽东感到中央权力重新布局有眉睫之迫。

于是，毛泽东提出了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意味非同寻常。还在建国之始，毛泽东即已流露过“在前台直接主持国事好？还是退到后面坐而论道好”的

<sup>1</sup>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141页。

<sup>2</sup> 赵家梁、张晓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134——135页。

心思，并征询陈伯达的看法<sup>1</sup>，但那只是意欲摆脱形而下之日常国事冗务、专事形而上之国家理论创新的运思。现在正式提出，原初设想没变，却已加入了一层更深的权谋意图。

张秀山、张明远据高岗对其谈话回忆：“1953年上半年，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的问题，在中央少数人之间进行酝酿。毛对高岗说他讨厌接待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不想当国家主席，只当党主席。‘让少奇去当国家主席吧，他喜欢那一套。’”<sup>2</sup>另一场合高岗对王鹤寿、陶铸等说道，主席说，中国的马林科夫（斯大林在世时指定的接班人）还未定，要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的最高苏维埃主席，无实权）。<sup>3</sup>

为此毛放出了一试探的气球。这一年12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专题讨论其外出休假期间中央工作的主持问题。“我要到外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七大以后，毛曾两次外出离开中枢，一次是重庆谈判，一次是出访苏联，均由刘少奇代理主持工作。如循惯例，或依一把手外出、二把手替代的组织原则，本次继续由刘代理主持皆顺理成章，而毛却提出要大家讨论，显然别有意涵。由于与会者意见不一，未能形成毛所希望看到的多数，毛遂宣布：“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sup>4</sup>

不难看出，毛泽东试图通过一线、二线之设，一方面将自己从繁文缛节的国事当中摆脱出来，另一方面把不再信任的刘少奇安放到荣誉性质的国家主席位置，从而废黜七大以来形成的刘少奇二把手也就是接班人地位，以达致中央权力重新布局的政治图谋。

因为高岗事件的意外发生，毛泽东这一图谋遭遇挫折，一时未能如愿以偿。高岗本是毛极为信赖与倚重的一员易刘大将，对毛一直忠心耿耿，与刘在建国以后亦积怨颇深。毛对刘的不满与挪其位置的意图多是通过高岗透露于外。然而，高岗能干有余，谋略不足，性喜豪爽，太过张扬，由于缺乏细密，轻信他人，过早泄露“天机”，引起党内不安与不满，加上陈云与邓小平重要时刻对高岗的揭发（也就是对刘少奇的支持），使毛感到刘的人气指数不可低估，势力不可小觑，换刘时机尚不成熟，于是调整部署，改变战略，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抛出高岗作为祭品，以此来平息一场党内危机。

## 二

---

<sup>1</sup> 《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123页。

<sup>2</sup> 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二，300页。

<sup>3</sup> 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二，310页。

<sup>4</sup> 参见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二，311——312页。

毛泽东的战略步骤被高岗事件所打断，刘少奇危机之下巧与应变，毛刘以党的事业大局为重，相互隐忍妥协，重又携手。五年之后的1959年，毛泽东正式将国家主席的位置腾挪给刘少奇。这使人产生一种幻觉，高岗事件后，刘少奇岿然不动，进而当上了国家主席，其接班人地位更为稳固。

表面看来确是这样，但究其实质并非如此。让刘少奇做国家主席、自己专当党主席，是毛泽东中央一线二线之设公开的预定目标，在这目标之下还隐藏着更换接班人的深层目的。没有迹象显示高岗事件之后毛改变了主意，放弃了自己确定了的战略目标，或者说认同了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毛泽东1956年和1959年的两次讲话很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邓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sup>1</sup>

“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帅，为副司令，我们俩一正一副。”<sup>2</sup>

一是将刘少奇与70高龄的朱德归为“跑龙套”的，认为“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一是以邓小平为副帅，把刘少奇撂于一边，其对刘不认之意味不言而喻。

而就在这一期间苏共二十大所引发的非斯大林化，不啻一重磅炸弹，震动了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作为中国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所受影响当尤为强烈和复杂。诚然，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使斯大林神话轰然倒塌，一直被认为真理化身的斯大林原来也犯错误，并非总是正确，多年受压的毛泽东出了一口恶气，获得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到由衷的痛快，此毛之所谓“揭了盖子”。但接踵而至的却是另一种深深的隐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使社会主义国家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受到削弱，个人独裁受到谴责，此毛之所谓“捅了篓子”，毛不免物伤其类，兔死狐悲，担心受此影响权威受损，更担心身后像斯大林一样遭遇不测。毛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中共同年召开的八大上突出强调集体领导和彭德怀提议并得到刘少奇同意将“毛泽东思想”一词从党章中删除<sup>3</sup>就是一个征象，虽然在此之前由于苏共一直不予承认“毛泽东思想”，毛本人多次也有过不提此词表示。

为预防斯大林现象在中国出现，毛泽东深谋远虑，未雨绸缪，一方面提出所谓正确的个人崇拜之说，强调“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鼓动个

<sup>1</sup> 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319页。

<sup>2</sup> 林蕴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四，415页。

<sup>3</sup>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240页。

人崇拜<sup>1</sup>，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其坚固无以撼动（耐人寻味的是，刘少奇对此亦步亦趋，明言“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在七大前，我就宣传毛主席，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也要搞。”<sup>2</sup>），一方面继续接班人人选的观察与培养，如八大擢升邓小平为常委，八届五中全会提拔林彪为党的副主席。在此期间，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冲突，中共指责苏联为修正主义，毛泽东顺水推舟，巧为利用，借机抹黑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在中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具有特殊含义的危险而忘恩负义的坏家伙，这样在道义上就为身后免遭不测预设了一道防护的屏障。

如果说，1953年毛泽东拟挪换刘少奇废黜其接班人地位是出于中央权力平衡的政治现实考量，那么，苏联斯大林事件的出现使毛泽东在关于接班人这一问题上忧心更重，困扰更大，思考更深，不仅虑及身后哀荣，而且将其与国家反修防修的意识形态挂钩，上升到了江山社稷千秋万代的高度。而刘少奇这一时期在有关政策与经济发展方针方面一如既往所表现出的右倾保守思想，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刘潜在着修正倾向的可能，因而对刘少奇更不放心。

这种不放心终于在大跃进失败导致国民经济陷入最低谷的1962年，在面对形势判断和经济调整的政策选择时酿变为强烈的不满，并以直接冲突的形式予以爆发。

正如国外学者研究指出的那样，新中国的各种新生事物，无不源自毛泽东本人的性格特征及其思想观念<sup>3</sup>，大跃进无疑是毛浪漫个性与乌托邦思想最具典型的历史产物之一。由于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狂热的错误实践注定了这一运动的走向失败，而在败象初显、路有饿殍之时，庐山会议对彭德怀为民请愿的激烈批判使狂热的运动火上添油，继续左向发展，最终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旷古灾难。

将大跃进灾难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个人显然不确，也不公平。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刘少奇同样态度积极，表现热烈，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言：“‘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关键在于，当发现大跃进导致灾难性后果，对这一后果做救济性弥补，并反思这一灾难性悲局时，刘少奇的良知与责任感使其敢于直面现实，做出一个与毛大相径庭的判断与选择，而为毛所不容忍。

1962年初召开的包括全国县委书记一级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是一次总结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会议。刘少奇据其在湖南家乡做调查时的耳闻目睹，在对大会做政治报告时提出，“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已不适用，进而把造成国家困境的原因直指为“三分天灾，

<sup>1</sup> 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126页。

<sup>2</sup> 沈志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三，513页。

<sup>3</sup> 白鲁恂：《毛泽东心理分析》，39页。



七分人祸”。<sup>1</sup>在随后的西楼会议上，刘对形势作出更为严峻的判断，认为“目前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于非常时期”，不要“怕说漆黑一团”，“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sup>2</sup>

刘“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与形势判断，对于发明并喜用“一个指头与九根指头”比喻形势大好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刺痛。大跃进寄托了雄心勃勃的毛泽东的太多浪漫而不无虚幻的诗意想象，虽然从根本而言乃一乌托邦梦想，但在毛心中，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和总路线一道构成的“三面红旗”是其领导中国进行经济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摆脱贫穷落后、实现超英赶美的强国梦想，尽管出现了一些失误，遇到了一定困难，但那只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作为一种方向，代表一种理想，它无容置疑，更不许触犯。而“人祸”之说，不仅是对大跃进的触犯与否定，同时意味着发动者将被推上祸首的位置，既为祸首，就要面临历史责任的追究。是可忍，孰不可忍？

因此，当刘少奇准备选择“非常的办法”——在农村试行包产到户，以贯彻经济调整、加快经济恢复时，毛泽东长期郁积内心的对刘的不满终于发作：1962年7月上旬的一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对前来汇报工作的刘少奇劈头一阵喝斥：“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忧心如焚，直言相告：“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sup>3</sup>

在刘少奇为当下出现的人相食这一历史罕象忧心如焚时，毛泽东念念不忘的是三面红旗与身后之事，两人的思想旨趣与现实关怀可见一斑。如果说在此之前毛刘之间存在的还是一种思想的分歧，那么如今表现出的已属于政治的分野了。这一分野的标志就是包产到户（毛语分田单干）的政策选择，也就是毛所谓的“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作为一种农业生产方式，包产到户虽然生产效率十分明显，深受农民欢迎，毛泽东虽然也曾做出过同意在个别地区试点的指示，但囿于狭隘的认识与政治偏见，毛泽东在根本上对“分田单干”十分憎恶，认为那“是瓦解农村集体经济，解散人民公社，是中国式的修正主义，是走哪一条道路的问题”。<sup>4</sup>刘少奇选择包产到户，意味着选择修正主义，选择走资本主义道路。

不特此也，在与刘少奇长期的矛盾与较量中，毛泽东另有一难为人道的心结，那就是彼此声望互为消长所带来的忌恨。自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毛泽东取得表面上的一时胜利，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失败导致的大饥荒却使党内外不满情绪急剧

---

<sup>1</sup>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网传 pdf 版。

<sup>2</sup> 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154 页。

<sup>3</sup>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90 页。

<sup>4</sup> 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205 页。

上升。至七千人大会时，党内的不满触及顶点。彭真会上的一番慷慨陈辞可谓这种不满情绪发泄的最典型表现：“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sup>1</sup>这样尖锐的言辞对毛而言恐为延安以来所罕见。

与其相对应，场外另有一番不同的景象：《人民日报》农村部17级以上干部在招待所集中轮训，“（报社负责人安岗）回来传达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当他们听到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大家出现了‘异乎寻常的热烈反应。起先，大家一下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什么大事’。可见刘少奇真的说出了人们的心里话。……把不少共产党员的心拨热了！”<sup>2</sup>

场内高层的尖锐批评与场外中层的热烈反应，不仅是对刘少奇观点的呼应与支持，对其实事求是态度的肯定与拥护，也反映了其声望和人气指数的高涨。然而，它却触痛了毛泽东深藏于内的那根敏感神经。天无二日，民无二主，从来就是中国社会政治的最大传统，也是影响权力者（一把手）政治行为心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权力来源不是依民授而是靠夺取的前民主社会尤其如此。刘少奇的声望水涨船高，毛泽东岂能熟视无睹而无动于衷？

就在此时（8月1日），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重新发表，很难说对毛不是一个刺激，不是使毛对刘更加猜忌的一个因素。《修养》曾是延安整风时期视为党员必读的经典，它的重新发表，在大跃进失败后的严酷年代，重新唤起共产党员“在各种艰难困苦的境遇中，去锻炼自己，总结实践经验，加紧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思想能力”<sup>3</sup>，不失政治的现实意义。然而，文中一些当年本是针对王明的文字，在情过境迁、时移世易之后，尤其在毛对刘已是心存芥蒂、不予信任的敏感时期，读来不免要让人产生联想。

“共产主义事业中的真正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个人主义的领袖和英雄，决不是可以自称和自封的。凡是自称领袖或者自己个人企图做领袖的人，他在我们党内决不能成为领袖。我们党员群众不会拥护那种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有个人野心和虚荣心的人，来做我们的领袖。任何党员都没有权利要求其他党员群众拥护他做领袖或者保持他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1962年从小说《刘志丹》里读到反党的阴谋，1965年从历史剧《海瑞

---

<sup>1</sup>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df。

<sup>2</sup> 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pdf。

<sup>3</sup>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罢官》中看到为彭德怀翻案的诡计，自然也可以从《修养》的字里行间感到刘少奇的“别有用心”。

毛泽东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与危险性。旋即在北戴河和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政治路线，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强力反击刘少奇右倾单干风，将中国这艘已是满目疮痍的航船再次向左转舵。

1962年在中国当代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也是毛泽东倒刘曲折历程中一十分重要的节点。就在这一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萌生了从政治上搬掉刘少奇的想法，开始着手部署这一战略图谋，并亲书手令对刘少奇进行秘密调查<sup>1</sup>。历史学家吕振羽的秘密被捕事件，作为近些年出现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史料证据，从一侧面证实了毛泽东的这一图谋。

这一年12月，历史学家吕振羽到湖南参加系列学术活动，于翌年1月乘火车返京，车到丰台，即被秘密拘捕。拘捕期内，吕被要求写出伪证，证明刘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吕当时为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领导下的自由职业者大同盟书记，为南京谈判穿针引线。但吕“宁以义死，不苟幸生”，不畏逼迫，拒做伪证，拘捕没有达到目的<sup>2</sup>。

此事与1953年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一脉相承，但性质更进一步，已是在编织罪证，罗列罪名了。这说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冲突发生了重大变化。毛从当初的削权意欲发展到今日的打倒图谋，既与十年来党内斗争激烈复杂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影响息息相关，也与大跃进失败以后毛刘声望互为消长的因素密不可分。但最根本的还是，在可以平衡与制约的相权之上，作为最高权力的君权不受制约，能够为所欲为。

很多人会感到困惑，此前一年也就是1961年9月24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被问及接班人一事时，明确表示自己的接班人是刘少奇。话音未落言犹在耳就心起倒刘之念，如何解释这一矛盾现象？

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建国以后在毛心中一直没获得确认，前文已有论及。大跃进失败之后，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殚精竭虑，力挽狂澜，为抢救国民经济于崩溃做出了极大努力，毛不能不看到并承认这一点。毛的这一说法，是对蒙哥马利元帅询问的一次被动回答，或是想借此作为口惠对刘表示奖赏与宽慰，而并不代表毛的真实想法。

毛泽东机心极重，城府极深，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曾当面许诺林彪，过两年

---

<sup>1</sup> 陈铁健：“瞿秋白何以由领袖成为叛徒？”爱思想网 <http://www.aisixiang.com/data/40805.html>

<sup>2</sup> 李冰封：《呼天辨诬董狐篇》，《书屋》2004年11期。

就交班<sup>1</sup>，而实际对林早就起了疑心。这一番表态，同样可以看作为某种政治目的而言不由衷的一次表演。不然，就解释不了对刘随即进行的秘密调查。

不过，毛泽东真正横下心来，决意政治上打倒刘少奇是在一年之后的1964年底与1965年初，也就是1970年12月毛泽东回答美国记者斯诺所问“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说的时间。由于国际上苏联政坛突发的一次最高权力非正常变动和国内四清运动与刘的一场正面交锋，使毛感到有种危机迫在眉睫，倒刘为势在必然。

### 三

1964年10月苏联政坛发生易变，勃列日涅夫以非正常方式逼迫最高权力者赫鲁晓夫黯然下台并取而代之。赫氏下台对向视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的毛泽东而言自是快事，但赫氏被逼下台这一不无政变性质的事件本身却引发毛的某种不安。中苏两党政治权力性质及结构的同一性使毛泽东有理由认为，既然苏联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中国也可能会有复制的危险。毛由是多了一层生前即被逼宫或架空的担忧与紧迫。其后不久11月在苏联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宴会上，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中国代表周恩来、贺龙的一番酒语：“不要让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妨碍我们。”“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仿效我们，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sup>2</sup>更增添了毛的担忧和不安。

这不是我们读史者在妄加推测或想象阴谋，而实在是毛泽东从莫斯科这面风月宝鉴中照见了北京城的魅影。此在一年后经毛泽东批准、林彪所发表的著名“政变经”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讲话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sup>3</sup>至于毛自认为的政变危机或魅影来自何方，总参谋长罗瑞卿作为文革前夕第一个垮台的高层1965年12月被打倒，而“据说刘少奇对罗的工作很赏识，要让罗当国防部长”<sup>4</sup>，很可以发人深省。

有了这样一层背景和因素，接下来在政治局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就发生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一系列言行激愤的惊人一幕。

1964年12月1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工作会议讨论四清问题，邓小平认为一般的工作汇报，可不必惊动毛泽东，在向毛汇报此事后说，如果工作忙，可以不必参加了。另一次会上，毛在刘讲话时插话，没说上几句即被刘打断。此两事使

---

<sup>1</sup> 《吴法宪回忆录》，807页。

<sup>2</sup> 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359页。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83、86页。

<sup>4</sup> 《李作鹏回忆录》（下），357页；参见《邱会作回忆录》，404页。

毛大为恼怒。会议结束时，江青请陶铸夫妇看《红灯记》，在休息时间，毛满腹牢骚又不无怨愤地问到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参会人员遂重被召回，继续开会。12月26日，毛泽东71寿辰，请客三桌，席间，毛对着李富春指桑骂槐：“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同我讲，啊，什么话都不同我说。现在什么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们是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28日，毛余愠未消，意犹未尽，携带《党章》和《宪法》来到会场，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你们一个不让我参加党的会议，违反党章，一个不让我发言，违反宪法。”“据我看，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sup>1</sup>毛泽东甚至冲着刘少奇轻蔑地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sup>2</sup>

一切政治的纷争皆因权力而起，古今中外概莫例外。一线二线本为毛泽东自己提设，毛也因此获得一种进退自如、可以任意出入一线二线的更大自由。但凡事均有两面性，由于没有权界明确区分的制度规定（不可能有此规定，权力者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两线界限模糊，使君权相权徒增冲突，这种冲突令毛在削权意图胎死腹中的陈年恨憾之外，又感到了一种被人架空、大权旁落的当下危机。赫鲁晓夫的意外下台，使自觉危机之中的毛泽东更看到一种险象。这样的時候，任何属下的稍有不慎，都会引起主上的深度猜疑与激烈反应。毛泽东对危机与险象的自我判断与强烈反应，促使了定下倒刘的决心。

陈伯达作为第一知情人为我们提供了如下回忆：“毛主席在那次会上拿出党章以申明他在会有发言权之后，一天晚上，他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二十三条’。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与列席会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sup>3</sup>

毛对刘表示了“很大意见”是陈伯达的委婉说法，王力的表达直接而明确：“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sup>4</sup>

不仅彭真、陶铸出面劝说，更有朱德、贺龙乃至“组织部长安子文受政治局

<sup>1</sup> 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399——403页。

<sup>2</sup> 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118页。

<sup>3</sup> 《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253页。

<sup>4</sup> 《王力反思录》173—174页。

和书记处多数人的委托”从中调和<sup>1</sup>，足以见出毛刘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公开化。在众人劝说之下，刘少奇再一次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又在党内生活会上检讨了不尊重主席的错误，暂时平息了毛心中的怒火。但毛倒刘决心既下，目标已定，余下的只是等待选择何种理由与方式，采取怎样的步骤与时机。

自60年代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中苏发生论战，经国家机器大力宣传与鼓动，阶级斗争为纲和反修防修这两大观念早已根植于人们心中，成为全党全国的共识，因此，将既定目标冠以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之名义，彰显正义与堂皇，在毛看来并不牵强。事实上也正是如此，1963年以后毛泽东在各种不同场合谈话与讲话中，频繁提到要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sup>2</sup>，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绝非仅为一般意义上的泛指。

但刘少奇并非一个人，几十年来一直担任党内二号人物，不仅有一大批拥戴者，其思想观点也有众多的支持者，在各级党政机关位居要津，掌握着实权，形成了毛在“二十三条”中所指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联通上下网络左右的官僚体系。毛泽东独断专行的政治个性对繁文缛节的官僚主义有种天然的抵触与反感，而建国十几年来没有制约的权力行使，使得民众对相当部分的党政官僚行为早已是怨声载道。于是，一生热衷于阶级斗争、幻想于社会改造的毛泽东，出于江山千秋万代的深忧远虑，从倒刘预谋之中看到并兴发了更大的政治与社会改造图谋。

1965年5月，72高龄的毛泽东畅游武汉长江，尔后重上井冈山，写下“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诗句，以一种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高迈姿态和气派向世人宣示他要发起一场新的革命。

这场革命就是以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序幕，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为纲领性文件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兴起简单地等同于要打倒刘少奇未免肤浅，但认为打倒刘少奇只是这场史无前例运动的一个副产品也未必高明。毫无疑问，倒刘是毛发动文革的一个直接且重要的目标，虽然不是唯一的目标。

毛泽东组织发表姚文，目的是通过重新高度评价“三面红旗”和充分肯定对彭德怀的批判作为突破口，引发对刘少奇及其路线的清算。<sup>3</sup>如果说作为文革引线，姚文深文周纳，意蕴含蓄，人们或不甚释解其大旨究竟何为，那么，半年过后，经历了罗瑞卿、杨尚昆、陆定一、彭真的相继垮台，文革战火正式点燃，下列“五一六通知”中的一段话，为毛泽东亲笔添加，矛头所指，中央高层不能不

<sup>1</sup> 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五，406页。

<sup>2</sup> 参见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313——320页。

<sup>3</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7页。

有所觉悟：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然而没有资料显示，刘少奇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指向自身的运动有过怀疑或抵触。这实在让人大惑不解。

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雨会打湿全身，刘少奇怎么会无动于衷，毫无反应？

或许是这场运动反修防修的宏大叙事和“政治正确”契合了刘少奇作为革命家的思想认识与国情判断，从而使刘不仅毋庸置疑，也深表拥护；

或许是心怀坦荡的刘少奇未能勘破毛泽东的老谋深算，因而未能察觉掩盖在宏大叙事下权力的真实意图？

但，以刘几十年党内复杂而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与经验，和多年来存在的与毛的实际矛盾冲突，加之前有陈伯达的危情提醒，后有毛泽东的直白威胁，似不可能对一场迫于眉睫、危及政治生命的险情昧于不察，蒙于不觉。最有可能作为解释的是，刘少奇感到了毛泽东所挥动的文革利剑，在具体而微的现实层面的指向，只是由于一方面这场运动的“政治正确”，让其无可提出置疑的理由，另一方面慑于毛建立在巨大权威上的独一无二的话语霸权，令其不敢表示违逆的言行，刘只能怀抱一种希望涉险过关的侥幸，心有志忑地亦步亦趋地被裹挟参与到这场运动之中。

这种解释可以进一步解释刘少奇在文革中一反常态的左倾领导。既要遵循毛的旨意，掀起文革运动，发动群众揭批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要谨慎从事，避免引火烧身，甚至还想有所作为，重新获得毛的信任。于是，刘少奇受权领导的文革初期，以一种宁左勿右的运动方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打成黑帮，把大批大专学校师生生活跃分子作为右派进行揪斗。殊不料，刘少奇这种自以为是的沿袭以往政治运动屡试不爽的左倾领导运动方式，不仅激怒了一大批已发动起来的包括红卫兵在内对官僚体制颇有积怨的革命群众，有损于自身威望与英名，“造成了反对刘少奇夫妇的长期尖锐的斗争”<sup>1</sup>，也给毛泽东提供了批判、打倒的口实，使自己跌入“请君入瓮”的陷阱。

1966年7月18日，一直在外地运筹帷幄遥控运动的毛泽东返回北京，当晚听取中央文革小组工作汇报，而将闻讯赶来求见的刘少奇拒于门外（这是刘少奇失信于毛、即将垮台的一个明确信号。此前彭真和此后陈伯达下台之时均有求见

---

<sup>1</sup> 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72页。

毛泽东被拒的遭遇)。

经过这一段时间远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毛泽东认为时机已到，条件成熟，当即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工作组打压学生运动为突破口，发起倒刘攻势。在8月4日常委扩大会议上，毛对派工作组一事提出极为严厉的指责，认为工作组镇压学生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并声色俱厉地喝斥：“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sup>1</sup>刘受此指责，说出一番“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的激愤话，更是惹得龙颜大怒。第二天，也就是8月5日，毛泽东奋笔写出震惊天下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痛斥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到此，毛泽东正式宣告与刘少奇彻底决裂，随即便废黜了这位党内排名第二的“接班人”，终结了与其合作数十年的搭档的政治生命。在其之后，刘少奇被打倒，受批斗，遭拘押，妻离子散，失去自由，最后被冠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永远开除出党”，于1969年11月殁死开封，已为天下共闻，众所周知。

通过以上史迹考察，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建国之初的思想分歧到60年代的政治分野，从权力平衡与生前接班的近忧到身后哀荣与千秋万代的远虑，毛泽东倒刘过程极其曲折复杂，又不断发展变化。在发展变化过程中，围绕权力运行，党内不同思想与宗派的激烈斗争，苏联政坛的易变启示，彼此声望的互为消长，传统君权的文化影响，诸多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际因素交织叠加，最终使毛泽东定下决心，不惜代价，与刘少奇彻底决裂。

从倒刘过程来看，毛泽东的确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在与政治对手的角逐与较量中的战无不胜。然而，历史才是最公正而严厉的判官。毛身后不久，刘少奇即获平反昭雪，毛自诩平生两大功业之一的文化大革命同时成为最不堪回首的民族记忆而为历史所否决，从而证明，毛的雄才大略所表现的原来不过是将属下乃至天下玩于股掌的巨大折腾，毛的战无不胜也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一场虚幻。

不过，历史沉淀之后仍有复杂与吊诡之处，需要人们慎加辨识与深思——这就是：当毛泽东五六十年代初批评指责刘少奇，图谋打倒刘少奇时，无疑是与历史作对；可是，当文革初起刘少奇推行左倾运动方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和学校师生活跃分子打成黑帮、右派进行揪斗，毛泽东把刘真正打倒时，很难说仍是违逆民意而缺乏一种正义的理由，虽然这场运动的发动依然是逆历史而

---

<sup>1</sup> 卜伟华：《“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和浩劫》（《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卷6），191——192页。



动。

2011-5-23 定稿，首发共识网

---

【热点研究】

## 刘少奇文革命运的悲剧性

萧 象

刘少奇至迟不晚于 1966 年 5 月中旬，也就是中央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之时，就察觉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自己的权力图谋，感到自己要挨整了。这是笔者在《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一文中得出的认定。这使刘少奇文革初期的政治行为更具一种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况味——在明知文革运动冲己而来的情况下，逆来顺受，躬身迎合，最终被这一运动所吞噬。刘少奇这一近乎灯蛾扑火式的悲剧性行为让人想起苏联的布哈林，布哈林也是明知自己蒙冤无罪而走向祭坛引颈就戮的。惟不同者，刘少奇之文革命运与整个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有着更为直接紧密的关联，其悲剧反映的不独为个体的荣辱生死，更是民族与国家的兴衰治乱。因此，我们愿意以此（刘少奇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为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分析并揭示刘少奇文革命运所呈现出的巨大而深刻的悲剧性。

1966 年 5 月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标志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通知》（“五一六通知”）。《通知》中最后一段被视为画龙点睛、也是最为要害的文字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其中指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正是从这段文字刘少奇敏锐而不无栗惧地感到了毛泽东的权力图谋，感到自己要挨整了。这种感觉来自于刘少奇与毛泽东长期以来实际存在的矛盾斗争、尤其是 1962 年以来与毛尖锐冲突所形成的本能反应，同时也来自于权力中人特有的政治敏感与判断。几十年党内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会议期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捆绑打成反党集团并受到的激烈批判，以及会场外邓拓和田家英与此不无关联的相继自杀，这一切都在告诉刘少奇，此次运动来势凶猛，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毛泽东此回绝对来者不善，自己恐是大难临头，凶多吉少。

面对整肃来临，政治生命岌岌可危，刘少奇是怎样的反应，我们已不得而知。但根据政治历史常识，我们不难推断，他有着三种可能的因应选择：一、挺胸而出，对“五一六通知”说不；二、主动辞职，避其锋芒；三、逆来顺受，侥幸涉

险过关。从政治家政治作为和历史评价的角度，三种选择的排序依次为上策、中策和下策。

人们一定会认为，第一、第二种选择属天方夜谭，绝无可能。在毛泽东拥有巨大权威和声望的历史条件下，刘少奇没有那份胆量与其公开对抗，也没有那份勇气提出辞呈。不错，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由于长期以来以刘少奇自己为首的中央一线领导人所营造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毛成了党的化身，位尊全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任何对毛的抵触就意味着对党的抵触，是引发全党共愤的反党行为，刘或不敢也无力与毛直接对抗；而在毛泽东捅破最后一层窗纸之前，主动辞职无异于长城自毁。

然而，如果我们从微观历史的角度，也就是从刘少奇作为政治行动者自主行动这一角度，考察历史，我们会获得不尽相同的看法。

一、选择挺胸而出，对“五一六通知”说不，不是没有可能。

以1949年之后的具体历史而言，虽然毛泽东威望日隆，权位至高，但并不意味着总是真理在握，一贯正确，任何时候任何事情都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没有遇到任何的质疑与挑战。1959年彭德怀庐山会议上对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的质疑姑且不论，就刘少奇，至少1962年与1964年两度“冒犯”过毛泽东，前者关乎农村经济政策调整，后者涉及四清运动重点指向，刘均大胆地向毛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发表了自己不同的看法。再从现实政治操作的可行性看，刘少奇也有一充足的理由可以将“五一六通知”束之高阁。我们知道，“五一六通知”主要是批判否弃“二月提纲”的，而“二月提纲”却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常委集体讨论通过的，并报送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少数服从多数，这是党无以撼动的组织原则。坚持组织原则，凭此一由，刘就有了可以说不的底气。何况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并不在场（不在京），没有与毛的面对面的难堪与直接冲突的压力，刘于行事更为有利。无论既往历史和现实情形都显示，历史存在着刘少奇可以说不的可能性。假如刘少奇做出了这一选择，历史很可能就是另外的模样，至少不会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疯狂。

那么，为什么刘少奇没有做出这一选择，没有挺胸而出抵制这份危及自己政治生命的纲领性文件呢？

毛泽东的巨大存在和文革反修防修的“政治正确”，是影响刘少奇行为选择的两种显而易见的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我们认为，另有第三种因素，或许更深刻的因素，在阻止刘少奇做出抵制“五一六通知”这一行动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党员行为准则规范。“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一项重要组织原则。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对这一原则有过堪称经典的表述：“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想到党的整体

利益，都要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问题、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刘少奇以“原则性、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而称誉党内，对党的原则从来就是“身体力行，说到做到”<sup>1</sup>。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这一原则已完全内化为刘少奇坚定不移的信念，成为指引与规范其政治行为的准则。

刘少奇心里当然清楚“二月提纲”并无原则问题，“五一六通知”对它的批判不过是借题发挥，其真实目的乃是冲己而来，但“五一六通知”提出的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及其代表人物，是包括刘在内的全党共识，是党的一项伟大事业。正是因此，面对着发起文革运动与个人挨整下台的矛盾，也就是在面对革命前途与个人命运冲突之时，刘少奇受“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行为准则的指引与规范，同时受到它的限制与约束，未能勇敢地挺胸而出捍卫自己，却不由自主地服从了前者。只要将刘少奇此前的“冒犯”与这次的“不冒犯”做一比较，这一问题可以看得更清。1962、1964年所以两度敢于直言，那是因为关乎人民的命运和党的事业，刘少奇无私无畏，理直气壮；而这次遭遇的是个人的挨整下台，牵涉个人问题和利益，刘难免心虚气短，所以缄默不语，隐忍不发。然而，这一隐忍不发的行为结果，让刘少奇最终陷入万劫不复的绝境。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历史的深刻悖论：刘少奇由于遵循“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而未能做出正确（最佳）选择，从而导致后来的命运悲剧——不得不承认，就是在今天，在坚持集体主义至上的社会，奉行这一准则仍是无以动摇的天经地义。如果要避免悲剧命运，则需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做出正确的选择，就意味着要违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准则，遵循良知，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越是信仰坚定的忠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就越是在可能在这时陷入两难境地。但又不能不指出，历史已经以残酷的事实告诫人们，如果人们不能遵循内心的良知，不能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站出来发声，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进行辩护，那么接下来的就一定是悲剧的开始。

二、刘少奇未能挺身而出，抵制“五一六通知”，做出最佳选择，那么，退而求其次，选择辞职呢？辞职是政治家遭遇严重政治冲突或遇到重大挫折难以为继时用以化解危机摆脱困境的一种策略和手段。把它看成自毁长城是一种政治无知与偏见的表现。既然刘少奇知道毛泽东绝对来者不善，自己不能做抵触对抗，又清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主动引咎辞职，避其锋芒，未尝不是一种保全自己的策略选择。

刘少奇以什么原由辞职呢？“二月提纲”是刘主持常委会批准通过的，“五

---

<sup>1</sup> 刘澜涛：《共产党人的典范》。

一六通知”既把“二月提纲”视为严重原则问题，批得一无是处，不妨以此为由，引咎辞职。遗憾的是，刘少奇却是近三个月过后，在文革战火已燎原全国，毛泽东奋笔写出致刘于政治死地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央常委会改组，其接班人被废黜，排名降至第八之时，才提出了辞职<sup>1</sup>，而此时已错过最佳时机。刘少奇未能在发觉毛泽东整肃自己的5月，在文革发动之时选择辞职，与其说缺乏勇气与智慧，毋宁是心存侥幸，怀抱幻想。

诚然，毛泽东既决意清除掉刘少奇，刘辞职不辞职，结局都一样，都会被揪出打倒。但效果大不相同，历史评价也有分别。试想，刘选择5月辞职，其情形很有可能如釜底抽薪，文革势焰势必大减。因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冲刘少奇这只“大老虎”而来，刘主动辞职在很大意义上就变成了“死老虎”，面对“死老虎”，别说群众打起来没劲，毛也会自觉无趣，失去大半鼓动的理由。更为主要的，对刘少奇而言，因此可避免直接卷入文革运动，而不会出现后来的“五十多天”使其令名蒙受玷污的负面行为，在历史评价上可以得到更多加分。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正因毛泽东以刘辞职成为“死老虎”感觉无趣，失去鼓动群众的造反理由，而不会接受这一行为。为了达到政治的最大效果，显示文革扫荡牛鬼蛇神的强大威力，毛需要让刘保持一定的政治身份，接受群众的批斗而遭受煎熬。事实也正是如此。1967年1月13日，被公开打倒而受到群众批斗的刘少奇幻想破灭，彻底醒悟，再次向毛提出辞职，请求“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虽说刘没在5月辞职，陷入被动，是一失误，但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刘从自身的屈辱体验感受到了文革的厉害，意识到了自己及家人的危险处境，愿意以辞职来换取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保障，平息陷入混乱的社会动荡。这是政治失败者发出的最卑微请求，也是落水者没顶之前欲抓住的最后一个救生圈。假如这一请求被接受，假如毛泽东抛下这一救生圈，就绝不会出现后来谁也不愿看到和接受的刘受尽凌辱而殁死开封的悲惨一幕。

前已指出，政治家辞职是化解政治冲突与危机的有效手段，也是政治失败者承担政治责任的一种表现。在讲究政治规则的现代民主国家，国家内部的政治冲突与危机，往往是通过负其责任的政治人物的辞职下台而得以化解，从而避免引起政治与社会的进一步动荡。但在文革时的中国，最高领袖却拒不接受刘少奇辞职。乍看起来这或许是毛泽东为了实现其政治效果的最大化，突显文革运动的现实意义，致政治对手于难堪而采用的一手阴招，但往更深一层看，它折射的却是：一个组织内部其成员个人自由权利的丧失殆尽与一无所有。中共以铁的组织纪律

---

<sup>1</sup> 见《刘少奇年谱》。

原则而著称。这一纪律原则规定，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而所谓服从中央，归根结底，就是服从党的主席这一最高权力。所以，除了最高权力一人，关键时候，包括党的副主席在内的任何一人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因此，别说辞职（求生）不能，就是自杀（求死）也要受到谴责。罗瑞卿不堪其辱选择自杀，被视为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陈伯达重压之下准备自杀，需要援引马克思女婿拉法格自杀后依然受到列宁的纪念为例，来证明共产主义者自杀不为背叛。一个组织或社会，如果走到其成员连辞职的权利和自由都没有时，距离悲剧也就一步之遥了。

三、刘少奇为党员行为准则所规范，又心存一定的幻想，如此，他能做的选择惟有第三种选择。其所以做逆来顺受的选择，自是希望通过最后的努力，以具体行动消弭毛泽东对自己的怀疑和误会，争取重新获得毛的信任，以化险为夷，涉险过关。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运动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表现积极，有所作为，以此来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和对毛的紧跟服从。于是，在其受权领导文革运动初期的几十天里，刘少奇一方面主持对彭、罗、陆、杨等已倒台的党内高层进行揭发批判，另一方面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打成黑帮，把大批师生生活跃分子作为右派进行揪斗。但很不幸，尽管如此，刘少奇还是不免掉进毛泽东早已设计的“请君入瓮”的陷阱，未能摆脱被揪出打倒的厄运。更不幸者，这些用以证明自己的文革行为，到头来却成为遭人诟病的负面现象，令其英名蒙受玷污，让自己从受害者同时成了施害者。

这其中，最发人深省、也是最能显示刘少奇命运悲剧性因素的，是其对于党内彭真、罗瑞卿等被打倒的同志的批判性行为态度。彭、罗堪称刘左臂右膀的亲信僚属，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刘最为清楚和了解。他们的突遭整肃，受到不实指责与诬陷，刘事先并未与闻，但事中保持沉默，未置一词，事后主持批判，毫无含糊，让人困惑。尤让人不解的是，罗瑞卿跳楼自杀，刘少奇态度不屑，辞色严厉，谴责道：“他的这种行动，是抗拒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

诚然，以前者而言，人们可以认为刘保持沉默是高压之下的违心之作，主持批判是划线切割的自我保全，但他如此自断其臂、向毛输诚的同时，显然忘记了“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古训。这一古训的一个隐蔽含义，翻用当代话语，那就是，如果我们今天看他人蒙冤而保持缄默，明天他人就会见我们沉沦而陷入沉默。1968年10月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刘少奇被诬指为“叛徒、内奸、工贼”，与会代表133人，除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一人外，“一致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党的最精英人物中已没有任

何人为其说话，“竟无一人是男儿”。

就后者来说，人们也固可以认为罗的行为确含愤激的情绪，但即便如此，对不堪其辱而选择自杀这一行为的追加谴责无疑反映了党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不幸者缺乏同情和怜悯。没有同情与悲悯，实质就是人道主义的失落。人道主义是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人类诸多“主义”之本。它的存在与施行，可以让人们哀于逝者，痛于伤者，扶于弱者，悯于败者。惟其如此，人类社会才不至因权争利斗而过于残酷无情，也不因尔诈我虞而陷于绝望境地。人道主义一旦丧失，人们为权争利斗必是残酷无情，不到你死我活，不肯罢休。刘少奇后来正是因此而遭受非人待遇与折磨，以至于惨死开封。

刘少奇惨死开封，时间在1969年11月。然而，资料显示，1966年6月下旬，就在他谴责罗瑞卿自杀的同时，他自己就有了死的预感，并为此做了准备。据刘少奇之子刘源回忆，1966年6月底，刘少奇将儿女们召集一起，说出一番令其“吃惊”的话：“今天我要对你们几个大孩子说一说，我老了，干不了多少年了。我死后，党和政府会给一些抚恤，但你们不能靠党和政府的照顾，要靠自己。你们的妈妈级别、工资不高，你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有责任帮助妈妈，把弟弟妹妹带大带好。特别是允斌，你是老大，要承担起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允斌“受到震动，当场拿出200元钱，后来存到了小妹潇潇的存折上”。<sup>1</sup>

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更为之悲哀。毫无疑问，刘少奇这是想到了死，在交代后事，做死的准备。但他想到的肯定不是自杀（自杀是自绝于党，被打倒之后刘明确表示“我绝不会自杀”），他想到的一定是被整死，死于他人之手。这就意味着，刘少奇已洞悉一切，看穿了这场运动的黑幕与残酷，不然，他怎么会想到死，想到向家人交代后事？可是，他现在仍然是党内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和国家主席，在主持领导这一运动，他为什么宁死也不站出来，与毛泽东摊牌，叫停这一运动？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sup>2</sup>

这是刘少奇在6月27日一个会上的讲话，与其对家庭的谈话发生在同一时间。两相比照，我们不难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与外部世界在经历一场疾风暴雨一样，刘少奇内心正处在一种剧烈冲突和极度分裂的状态，一方面向显然很难理解的民主人士们高调宣讲文革运动的革命性、正确性与必要性，另一方面畏惧于

<sup>1</sup> 黄铮：《王光美访谈录》pdf，106页。

<sup>2</sup>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毛泽东可怕的权力图谋及其黑幕与残酷，对个人前途悲观无望，而不得不做最坏的打算。由于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而党的领袖代表着党，是党的利益的集中表现，与毛摊牌，意味党的分裂，党的利益和形象就会受到损害。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利益，个人不得不忍辱负重，做出牺牲。这就是说，刘少奇想到了“最坏的打算”而不能与毛泽东摊牌，乃是为了维护党的团结和利益这一大局，所做的忍辱负重，自我牺牲。此与一个月前选择逆来顺受同出一理，都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行为准则规范下的身不由己（当然也可以说是自觉自愿）。

为了维护党的利益大局和形象，忍辱负重，宁愿牺牲自我，而走向祭坛，刘少奇作为信仰坚定的老一辈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殉道精神诚然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悲壮地走向祭坛，不仅没有如其所愿维护住党的利益和形象，党的利益和形象反而一落千丈。因为，刘少奇之死将党领导的文革运动毫无人道人性的残酷与残忍暴露无遗，党的形象因此大受损害，党的事业为此遭受严重挫折——但，这已与刘少奇毫无关系，不是刘之过，此正如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刘，使全国人民从文革中觉醒，不是毛的功一样。

刘少奇断不会想到自己忍辱负重的行为会是这样的结果。不，刘少奇应该想到了这点。只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从他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终生献身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革命家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受尽迫害与折磨的角度。

在被打倒到死去的近三年的时间里，他应该对此有过痛苦的反思。反思的结果，只是因为太过残酷，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愿说出。正如彭真，历经文革劫波之后，被问及文革时说道：“文化革命很复杂，我心中有数不好讲。”

不好讲就是怕讲，怕什么呢？怕影响党的形象，影响最高领袖的形象。这仍然不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之党员行为准则的规范。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966年5月当刘少奇察觉毛泽东发动文革整肃自己的图谋时，他面临着上、中、下三种因应对策选择，由于毛泽东的巨大存在和文革的“政治正确”，更由于“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一党员行为准则的严格规范，使得刘少奇未能作出挺身而出捍卫自己、抵制“五一六通知”的最佳选择，而对毛泽东的心怀幻想，又使其错失了在最佳时机提出辞职的第二选择。于是，刘少奇做出了三种选择中最不好的选择，这一选择不仅让他的英名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直接导致了他的命运悲剧。其悲剧因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所以巨大，而悲剧显示由“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行为规范，党员自由权利的丧失殆尽与一无所有，毫无怜悯与同情之心的人道主义的失落”这三大因素所构成，因而深刻。

---

【热点研究】

## 张春桥与安亭事件的再审视

萧 象

文革初期上海突发安亭事件，张春桥受中央派遣返沪应对处理，却“临阵变卦”，擅做主张，出人意外地与造反工人达成妥协，事后获得毛泽东的认同支持，从而将一起可能的工人因造反受压、上访受阻而卧轨堵塞交通的重大群体事件，转变为“官逼民反”而不无正义的革命行动。

安亭事件直接影响了文革发展进程，成为红卫兵造反向工人造反转变的节点和标志。张春桥变卦是安亭事件转变的关键，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违背组织程序，加上张的负面历史定位，其行为多被视为“政治投机”而为人诟病。50年过后，依据相关研究资料与回忆文章，重新审视这一事件，我们可以更为客观、从更接近于历史本真的角度解读张春桥变卦的行为原因，同时通过这一解读能够获得一种错误历史逻辑指引下“小善”致“大恶”的历史启示。

1966年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工总司）宣告成立。这是上海一些工厂造反派代表在京沪两地红卫兵鼓动与帮助下，自行组成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此前上海工矿企业的文革组织多为官方授意成立，工人跨行业自行组成的还是第一家。上海市委根据中央不得成立全国、全市性工人组织的精神，对工总司采取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三不”态度。由于未能得到市委市政府的承认支持，加上与市委代表谈判也无结果，工总司认为市委有意怠慢，压制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定集体赴京告状，“请旨造反”。10日凌晨工总司负责人潘国平和王洪文带领数千工人涌入火车站，登乘不同车次，兵分两路，赴京上访，分别被阻于南京和安亭。阻于安亭的工人，于风雨交加之中情绪激愤，拦车卧轨，致沪宁铁路中断，交通受阻达30多小时，酿成轰动一时的安亭事件。

文革初期，天下大乱，红卫兵造反打、砸、抢，冲击党政军机关，甚至打死人的各种严重事件全国各地迭出不断，屡见不鲜，但由造反工人拦车阻断铁路交通，造成严重事态，却是第一次。中央闻而震惊，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坚持既定方针，不承认跨行业组织，也不认为拦车卧轨行为是对的，同时派遣张



春桥飞沪处理。

上海市委作为直接负责的地方党委，事件甫一发生即做出应急反应，一面组织人员赶赴安亭现场，对工人进行安抚、劝说，一面召集会议，研究对策，对事件认定与人员处置提出预案。据有关材料披露，市委与公安局已把组织者“十五名革命工人打成反革命，並作出定案。其中有的判处死刑，有的同志分别被判不同年限的徒刑，並已作出決定，打算将这些同志分配到安徽等地××农场劳改。”

1

上海市委的处置预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将安亭事件性质内定为非人民内部矛盾，以最严厉的处置方式，对组织者以严惩不贷的罪犯论处。在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这样的做法并不奇怪，它反映了党治天下官本位固有的权力思维：凡违背权力意志，不听从领导者，均非良善之辈，此辈人员一旦聚众闹事，为非作歹，决不轻易放过，必须从重从严处置。工总司之成立违反中央有关规定，已是非法，组织煽动群众赴京上访、卧轨拦车阻断交通，更构成犯罪，其组织头目自是罪责难逃。

然而，历史出人意外，常常会因为某种不确定因素的出现而发生改变。从中央派遣张春桥飞抵上海的那一刻起，安亭事件即开始逸出上海市委预设处置的轨道，向着另一方向发生转变，从一种对当下产生的即时影响，开始向着对未来历史的历时影响发展。

作为中央派遣代表，张春桥的任务毫无疑问是执行中央不妥协让步、不承认跨行业组织的既定方针，做好劝解工作（张抵沪之前，铁路业已恢复通车）。但出乎意料的是，张春桥未经请示同意，临阵变卦，突破中央既定框架，擅自与工人达成妥协，签字承认工总司为合法组织，让包括中央与上海市委在内的所有领导层人员大吃一惊。陈丕显得知消息后愤怒不已，第一时间打给陈伯达电话，质问：“（张春桥这个）文革小组副组长有没有权力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背着华东局、上海市委，直接同工人组织签字，达成协议，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张春桥眼中还有没有国家法律、党中央的指示、政策？”如果不是毛泽东事后一锤定音，给予认同与支持，张春桥只怕是乌纱不保，提前十年进入秦城。

张春桥临阵变卦，擅做主张，与工人达成妥协，使事件出现戏剧性逆转，是整个安亭事件引人注目的一个焦点，也是张春桥在安亭事件中给世人留下的最大谜团。由于没有资料显示张春桥飞沪之前领受过毛泽东的指示，怀揣尚方宝剑，加上张在历史上的负面定位，人们多把它看作是张春桥一次先意希旨的政治投机行为。

诚然，作为毛泽东思想传人，张春桥自 50 年代中期因柯庆施因素而进入毛

<sup>1</sup> 《安亭风暴——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斗争史之一》，《工人造反报》第 20、21 期合刊，引自王锐：《‘安亭事件’的再认识和再研究》，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五十五期。

泽东视野，获得关注，便一直用心于研习毛泽东思想。1966年由沪调京，参加中央文革小组，进出中南海，得以近距离接近、观察毛泽东，耳濡目染，耳提面命，对毛泽东文革思想及其策略发展有更为深切与准确的把握，因而窥悉毛泽东欲将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运动发展的文革意向，先意希旨，做出惊人之举。

但若将此说视为“投机”，似有疏浅之嫌，解释不了张抵沪之后与工人谈判的曲折过程。我们知道，张春桥是11日晚飞抵的上海，按陈伯达要求直奔安亭现场，依据中央精神与工人代表展开通宵谈判而未果，12日上午接续谈判，张提出工人先返回上海，然后再讨论所提要求，为大部分工人所接受，张于当晚返回上海。13日上午张参加上海市委常委会专题讨论工总司问题，下午再与工总司谈判时，乃出惊人之举，签字同意工总司“五项要求”。

如果仅为“投机”，他何以不在11日抵沪当晚经通宵谈判至次日的上午就与工人达成妥协，这岂不更干脆利落，显示他快刀斩乱麻的处事能力？何必要挨到13日参加市委常委会之后，额外背上“反对华东局、上海市委”、“阴一套，阳一套”的骂名？显然，这不符合“投机”逻辑，在“投机”的背后，当另有原委值得探寻。

徐景贤是现场签字的见证者，陪同张春桥参与了13日下午的谈判，也是整个事件的知情人，晚年对文革有一定程度的反思，为普遍所接受。在《徐景贤最后回忆》中，谈及安亭事件，对张春桥的临阵变卦，他提供了这样一种说法：

十一月十二日早上，工人们把张春桥请到一辆卡车上，在安亭车站和群众见面。……工人们在现场“控诉”上海市委，反复强调自己的行动是被迫的，要求市委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张春桥站在卡车上淋着雨听完了工人們的“控诉”，据他后来告诉我：他觉得工人們的过激行为是有因的，同时他们要求成立这样的组织是符合宪法的，也是符合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精神的，张春桥觉得，听了工人們的发言，原来他来上海以前中央文革考虑不同意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组织，也许是应当改变的。

原来张春桥“临阵变卦”，起因于和现场工人的接触对话，与听取工人的“控诉”有关。这或许让人感到有些意外，但细加审察，符合人物历史心理逻辑，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让人们对于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有更深入的了解。

关于签字情况，徐景贤的回忆证词尤为珍贵，为解开张春桥变卦之谜提供了至为关键的第一手资料。徐景贤说，他下午陪同张春桥如约来到文化广场，那里集聚了数千工人在等待。参与谈判的工人与红卫兵代表有二三十人之众，坚持要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他们到安亭去的行动是“革命行动”。

“张春桥说成立全市性的跨行业工人组织将对全国造成影响，劝他们遵守中央的规定，但参加谈判的工人和红卫兵们坚持自己的意见，谈判僵持了一个多小

时没有结果。……谈判进行到这个时候，有人向潘国平递去一张纸，上面写了几项要求，潘国平看后交给了张春桥。我站在张春桥的身后，看他拿着这张纸犹豫、踌躇了一阵子，然后拿起笔在纸上写了一些文字，并在最后签上‘张春桥’的名字。”

张春桥 13 日下午谈判时仍坚持中央精神，是在僵持不下的最后时刻突生变卦，改变了态度。这不仅拓宽了我们析疑的思路，也解开了为什么张的态度表现与上午市委常委会上不一致的疑点问题。可以确定，常委会上他还没有定下支持工总司的最后决心，不然就不会出现下午谈判的“僵持”。或者说，他当时腹怀“变”与“不变”两个方案，“不变”为其首选，“变”为备案，如此，对不支持工总司的会议决定也就没有或不便表示异议。这种态度表现反映了张春桥心有城府，政治性格藏而不露，高深莫测的一面。

至此，我们可以揭开张春桥的变卦之谜，对其擅做主张，突破中央既定框架，签字承认工总司的举动做出合理解释：

张春桥抵达安亭之后，通过与现场工人接触对话，读出其行为中的某种“合理因素”——“革命性”——这是大凡群体行动（群众运动）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共性，凭藉对毛泽东思想及其文革发展意向的窥悉和预判，张春桥敏锐地感觉到这种“革命性”是毛泽东推动文革发展所希望和愿意看到的，也是所需要和借重的，而承载这一“革命性”的工人造反组织符合文革发展方向，理应获得承认与扶持；但这不仅意味着挑战上海市委，更违反中央既定方针政策，兹事体大，非同小可。经过反复考量与权衡，张春桥以执行中央精神为上策，在上策不起作用、谈判僵持不下时，横下一心，放胆一搏，签下工总司“五项要求”。张春桥签字，因是不愿示人的备案，又是临机应变，无法事先请示，所以自行其是，擅做主张。

客观而言，张春桥横下一心的举动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表面看起来他是在上海市委与工总司之间选边，实际却是在中央政治局与毛泽东之间下注。他把自己的政治生命全都寄押在毛泽东一人身上，毛的态度决定他的命运与前途。而在毛泽东点头表态之前，又有谁敢保证上意一定会眷顾自己，尤其在这文革初期中央政治云谲波诡翻云覆雨变幻无端之时！“我当时是提着骷髅头签字的。”<sup>1</sup>张事后所言，道出签字一刻承受的巨大压力与风险，但这也恰好显示张春桥政治性格的另一个方面——胆大冒险与决断独行。这是一般文人从政者所欠缺的，张春桥所以获得毛泽东赏识与重用，盖与此一方面的因素不无关系。

将一起可能的工人因造反受压、赴京上访受阻而卧轨堵塞交通的重大群体事件，转变为“官逼民反”而不无正义的革命行为，进而成为具有历史影响的文化

<sup>1</sup> 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料》，未刊稿，174 页，参见郑重：《张春桥：1949 及其后》，247 页。

标志性事件，文革发展由此从红卫兵运动转向工人造反运动，张春桥此中所扮推手作用引人注目。工总司因此得以“起死回生”而雄起。在工总司眼中，张春桥无疑是执行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代表。而从争取工人合法权利（宪法赋予公民结社自由权），纾解官民矛盾，以及社会群体事件处置的视角，比较上海市委对工人首领的严厉处置预案，不能不说，张春桥放下身段的妥协让步亦更俘获人心，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因素。

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当我们拉长时段，从历史的宏观视角，就会发现这一具有一定历史合理因素的举措，带来的并不是正面的积极效应，相反，它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安亭事件之后包括工总司在内的各类工人组织迅速崛起壮大，上海不仅发生影响全国的大规模派战武斗，引发比安亭事件更为严重的阻断铁路交通的昆山事件，更有“一月风暴”席卷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被批斗打倒，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经济生活极度混乱，而造反组织则自下而上全面夺取上海党政大权。从此，夺权之风遍刮神州，整个国家进入文革以来最动荡不安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切，安亭事件均与其存在着前因后果的密切关联。

一桩看起来具有一定历史合理因素的举措，其作用力却如同推倒第一张多米诺骨牌而引发后续一系列连锁“倒塌”反应，社会因此陷入更大动乱。这一现象委实耐人寻思。

如果我们把张春桥支持工总司这一具有一定历史合理因素的行为视作“小善”，那么“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给社会秩序与政治经济生活带来的破坏无疑是“大恶”。善因结善果，是佛经说法，也符合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但安亭事件与“一月风暴”呈现给我们的却是“小善”致“大恶”。这一违逆社会常规的反常现象原因何在？是张春桥早有预料而有意为之，还是某种历史逻辑的演绎结果？

毛泽东发动文革未曾想到有红卫兵横空出世，更未料到北大一张大字报能改变整个运动局势，甚至连文革时间究竟是一年半载还是两年或三年都无法预测与把握控制。文革领导者尚且如此，遑论张春桥。所以张春桥不可能在安亭事件时就预料到“一月风暴”与全面夺权，也就不存在有意为之。那么，这是一种怎样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小善”致“大恶”的历史结果的呢？

张春桥受中央派遣，本为劝说工人回到工厂坚持生产，但当他抵达现场后却产生倾向工总司造反的新想法，面临支持“造反”还是维护“生产”的两难矛盾，用当时的话语，也就是面临“抓革命”与“促生产”的冲突选择。从根本上说，“革命——生产”是一组对立的矛盾关系，也是两种不同的逻辑选择。支持工总司造反必然意味着工厂生产受到干扰，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张春桥当然心知肚明，

但经过利弊权衡，最后不惜以此为代价，做出“革命”的逻辑选择。正是因为“革命”这一逻辑选择，才引发后面推倒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反应。而“一月风暴”全面夺权及革命委员会等事物的出现产生，自不用说，更是“革命”这一逻辑的延续与发展的结果。

其实，“革命——生产”的逻辑选择，不独表现在安亭事件的张春桥个人身上，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也是1949年执政以来中共集体面临并为之困扰的一个重大政治选择问题。这一问题一直左右着党的路线走向与政策制定，党内的诸多矛盾冲突无不围绕此一选择问题而发生。甚至毫不夸张地说，“前后三十年”之划分，也是因此而产生。强调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遂成前三十年之面貌；坚持生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乃有后三十年之光景。文革十年不过是强调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端表现而已。张春桥安亭事件的作为则是这一极端表现的典型代表。

对“革命——生产”孰为轻重的不同选择，不仅可以反映党内的不同思想倾向，更导致不同的政治荣辱进退。陶铸由于强调生产反对成立跨行业工人组织，即便张春桥签字已成事实，仍坚持己见，因而违逆毛意，受到批评，最终导致下台。陈伯达在所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发展生产，背离继续革命的毛泽东思想，为一年后庐山出局埋下祸因。反观张春桥，从1958年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到安亭事件中所说：“如果工厂文化大革命不搞，即使导弹上了天，卫星上了天，生产大发展，中国还会变颜色。”再到1975年推出《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其坚持“革命”缓行“生产”或“革命”压倒“生产”的逻辑思想，一以贯之，始终不渝，所以在文革舞台走得最久走得最远。

张春桥在安亭事件的作为与“一月风暴”的全面夺权，为同一历史逻辑的演绎结果，却前者为“小善”，后者为“大恶”，何也？原因在于，安亭事件工人行为起于权利诉求，因而具有正义性，不管张春桥出于怎样的动机目的，他看到了这一点，予以肯定，他的肯定（签字）也就具有了合理性。而在“一月风暴”，造反组织从最初的正当的权利诉求演变成了僭妄的权力夺取，因而不具有历史正义。这一过程极具历史的复杂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由于工总司的权利诉求而不无正义的行动中，同时包含着一些破坏秩序的非理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工总司获得肯定时有意无意地给遮掩了，这就使得非理性因素未能得到及时清理与反思，反而受到鼓励与纵容，在其后一系列行动中得到不断复制、扩大，以至恶性膨胀，造成“大恶”。

无论安亭事件时张春桥行为的“小善”，还是“一月风暴”中全面夺权的“大恶”，遵循的都是同一的历史逻辑，这一逻辑源于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所以“小善”与“大恶”是在毛泽东文革思想的“统帅”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结果。

而历史早已证明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错误。因此我们最后获得这样一种判断与启示：

在一种错误的思想逻辑指引下，即便一时的“小善”也会导致“大恶”，或者说，由于一种错误的思想逻辑指引，即便一种短期的历史合理性最终也将通向更大的历史祸害。

2016/10/18 首发于爱思想网

2020 年 8 月修订